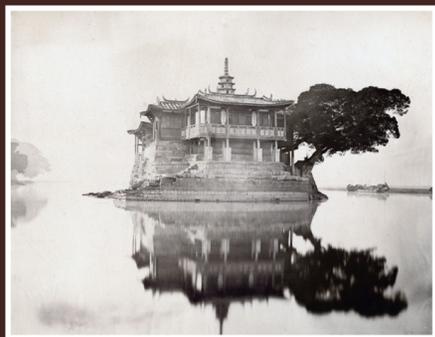




新书预告

《中国摄影史：本土摄影师1844—1879》

本书通过14个章节的内容，讲述了1844—1879年间中国本土摄影师和照相馆的活动，对于摄影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中国摄影的特点，以及分地域摄影活动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对于中国早期摄影版图的完整，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补充。



封底照片：“福州小金山”，约1870年，约翰·汤姆逊拍摄。

中国摄影史

西方摄影师 1861—1879

[英]泰瑞·贝内特 著
徐婷婷 译

中国摄影出版社

ISBN 978-7-80236-869-9



定价：328.00元

中国摄影史

西方摄影师 1861—1879

[英]泰瑞·贝内特 著 徐婷婷 译



中国摄影出版社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中国摄影史”系列丛书

《中国摄影史：1842—1860》

《中国摄影史：1842—1860》论述了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末期（1842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1860年）这一时间段内的中国摄影史，综合游记、铜版画、老照片等多种素材，考证了中国最早的照片及其摄影师，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在华的摄影师和作品，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华的摄影师和作品，全面介绍了1842—1860年间在中国拍摄了照片的摄影师和保存至今的摄影作品。

《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1861—1879》

本书是“中国摄影史”系列丛书的第二卷，记述了19世纪60和70年代在华活动的西方摄影师，对他们的生平和摄影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本书内容较第一卷更加丰富，共收录400余幅照片，很多资料之前都未经发表，为迄今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摄影史研究最详尽的专著。书中考证了逾80位专业和业余摄影师的生平活动，其中不少鲜为人知，一些照片的拍摄者首次得到确认。

封面照片：“北京新娘和新郎”，约1877年，托马斯·查尔德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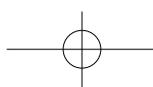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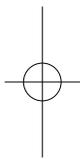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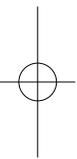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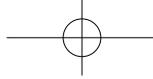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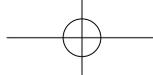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摄影史

西方摄影师1861—1879

本书入选“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
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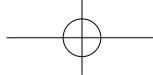
中国摄影史

西方摄影师1861—1879

[英] 泰瑞·贝内特 著

徐婷婷 译

中国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摄影史. 西方摄影师: 1861~1879 / (英) 贝内特(Bennett, T.) 著; 徐婷婷译. --北京: 中国摄影出版社, 2013. 1

书名原文: 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ISBN 978-7-80236-869-9

I. ①中… II. ①贝… ②徐… III. ①摄影史—中国
②摄影师—生平事迹—西方国家—1861~1879 IV.
①J40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319386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 01-2012-9051号

Copyright © Terry Bennett, 2010

Original title: *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Western Photographers 1861—1879*, Published by Bernard Quaritch, 2010
Chinese Edition ©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2013

中国摄影史: 西方摄影师1861-1879

作者: [英] 泰瑞·贝内特

翻译: 徐婷婷

出版策划: 赵迎新

责任编辑: 常爱平 李姗姗

出版: 中国摄影出版社

地址: 北京东城区东四十二条48号 邮编: 100007

发行部: 010-65136125 65280977

网址: www.cpphbook.com

邮箱: office@cpphbook.com

制版: 北京杰诚雅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 中印集团数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2

印张: 36

字数: 669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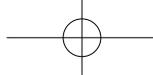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版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236-869-9

定价: 3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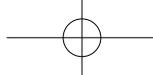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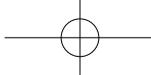
目 录

前 言	vii
致 谢	ix
引 论	xi
第一章 香港照相馆	1
引 论	
S.W.哈尔西	
西尔维拉	
威比金与凯恩斯	
马西阿诺·安东尼奥·巴普蒂斯塔	
威廉·普赖尔·弗洛伊德	
香港影相楼与埃米尔·瑞斯菲尔德	
香港影相公司，恩斯特·瓦塞尔与亨利·埃弗里特	
亨利·舒仁与F.波普尔鲍姆	
“底片库”	
第二章 北京的摄影活动	33
引 论	
列夫·斯坦潘诺维奇·伊格莱夫	
普鲁士东亚远征军	
P.博格杰夫医生	
德贞医生	
托马斯·查尔德	
京城的其他摄影师	
第三章 通商口岸的摄影活动	84
引 论	

上 海	
引 论	
威廉·托马斯·桑德斯	
J.纽曼	
理查德·香浓	
瓦尔特·丁摩尔与丁摩尔兄弟	
洛伦佐·F.菲斯勒	
亨利·查尔斯·坎米奇	
约翰·雷迪·布莱克	
其他上海摄影师	
福 州	
引 论	
F.舍恩克	
汉 口	
引 论	
威廉·乔治·托德	
宁 波	
引 论	
J.C.沃森少校	
厦 门	
引 论	
圣朱利安·休·爱德华兹	
恩斯特·奥尔末	
广 州	
引 论	
西尔维斯特·达顿与文森特·迈克尔斯	
天 津	
引 论	
琼斯·蓝普瑞医生	



第四章 流动摄影师199	附录1 早期在华拍摄的立体照片353
引 论	
约翰·威尔森	附录2 威廉·桑德斯的相册367
保罗·尚皮翁	
于勒-费里克斯·阿波里奈尔·勒·巴	附录3 托马斯·查尔德所拍北京照片378
弗雷德里克·威廉·萨顿	
S.辛迪	附录4 威廉·弗洛伊德所拍香港、澳门、广州 与北京照片的评论文章382
约翰·汤姆逊	
威廉·伯格	附录5 约翰·汤姆逊所拍香港照片的评论393
古斯塔夫·里默	
雷蒙德·冯·斯蒂尔弗莱德-拉特尼兹男爵	附录6 洛伦佐·F.菲斯勒的皇城拍摄记——“中 国冒险!”395
丹尼尔·R.克拉克	
大卫·诺克斯·格里菲斯	附录7 上海早期摄影：纪念范约翰——“潮湿 气候下的干版摄影术”398
其他流动摄影师	
第五章 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285	附录8 保罗·尚皮翁远东摄影活动的困难种种400
引 论	
拍摄了西洋楼的摄影师	附录9 东亚的摄影活动：斯蒂尔弗莱德男爵403
第六章 摄影期刊303	附录10 摄影在中国：格里菲斯所作三篇文章405
《中国杂志》	
《远东》杂志	附录11 《远东》杂志摘录411
结 语312	附录12 裨治文的银版照相机417
摄影术语314	
中国摄影年表（截至1879年）317	
中国摄影分区年表（1842—1879年）323	
在华摄影师名录（1842—1879年）331	
参考文献343	



前言

这套“19世纪中国摄影史丛书”计划出版三卷。本书为第二卷，记述了19世纪60和70年代在华活动的西方摄影师。他们中既有专业摄影师，也有业余摄影爱好者。我们熟悉的约翰·汤姆逊、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和威廉·弗洛伊德（William Floyd）也在其中。关于这20年里中国摄影师的活动情况，我们将在第三卷中单独记述。

着手写作中国早期摄影史时，我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连贯的叙事线索，把摄影师、摄影作品和具体的时间、区域对接起来。当然，凡事皆有例外，比如我们现在已掌握了很多关于约翰·汤姆逊的信息，关于他的研究著作有不少已出版；学术界对某些特定区域（比如香港）摄影发展情况的研究也已取得了宝贵的成果。但总体来讲，中国早期摄影史的写作仍然面临很大困难，而重中之重就是对现存历史照片作者的认定：我们不清楚这些摄影师具体的行踪，不能确定他们在某个村庄、市镇到底停留过多久。因此，我决定把挖掘、厘清基础的史料信息作为研究重点，首先解决照片由谁拍摄、在哪里拍摄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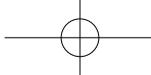
清朝幅员辽阔，摄影师又人数众多，这无疑增大了研究的难度。在这套丛书的首卷《中国摄影史：1842—1860》（中国摄影出版社，2011年出版）中，我曾浅尝辄止地谈到问题的艰巨性，还曾提及现存佚名照片作者鉴定工作的重要性。我认为，这始终是一切后续摄影史研究工作的前奏，是摄影史学家或艺术史学家研究工作的根基。而社会史学家如果可以确定照片的拍摄者，则可以进一步得到拍摄时间、背景、照片为什么拍摄和在哪里拍摄等一系列信息。比如说，如果我们发现一张未署名的

中国早期照片实为于勒·埃及尔的作品，就可以相应推断出，照片的拍摄时间为1844年，拍摄地点在澳门、黄埔或者广州。

本书所涉及的摄影师在中国活动的时间范围是1861年到1879年，但书中也收录了一些拍摄年代稍晚的作品，这些作品的拍摄者大多在华活动时间较长。比如威廉·桑德斯，1862年他在中国开设了一家照相馆，一直经营到1888年才返回英国——因此本书把他稍晚时拍摄的作品也收录进来。

本书未涉及对1879年后在华西方摄影师的考证。这是因为，我原本打算把这套丛书的研究时间下限定在1911年清朝灭亡，但现在看来，这样的时间跨度在三卷本篇幅内很难完成，可能需要另辟一册再专门记述；再者，我的研究兴趣本是湿版时代的摄影师，而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干版技术逐渐普及，拍照变得简易多了，因此我决定还是专注于湿版时代的摄影研究。

本书对专业摄影师和业余摄影爱好者一视同仁。实际上，对书中这些摄影师来说，硬性的分类似乎本身就有待商榷。像约翰·汤姆逊和威廉·弗洛伊德这样的专职摄影师，他们的名字和开办的照相馆在当地报纸和沿海贸易名录中总会留下痕迹，因此被遗漏的可能性不大。而对于像亨利·坎米奇（Henry Cammidge）、保罗·尚皮翁（Paul Champion）、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e）、圣朱利安·爱德华兹（St. Julian Edwards）、恩斯特·奥尔末（Ernst Ohlmer）和弗雷德里克·萨顿（Frederick Sutton）这样的非职业摄影师来说，情况则不同：他们虽然也努力找寻各种资助，但毕竟从事的并非全职的商业摄影行为，因此，



后人可能始终无法勾勒出他们摄影活动的全貌。至于纯粹的摄影爱好者，由于留下的线索实在太少，研究材料就更加短缺了。

由于篇幅所限，也出于对丛书最终目的的考虑，本卷未涉及对中国摄影师的考证。我希望这套丛书可以成为读者和研究者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国早期摄影活动时的导航仪和引路标。中国摄影师的活动涉及了很多个单元的内容，层次丰富，人物和场景都难以简单处理，虽未成稿，我已隐约感觉应把这部分内容作为第三卷单独论述。

书中大多数摄影师都按姓名专辟条目进行叙述，书末另附摄影师名录可供查询（第一卷和本卷皆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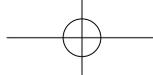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图片说明中，对清末文献原注皆有保留，并以双引号标示。除非特别说明，照片皆为“蛋白照片”。

本卷书末附有完整参考文献列表，书中引文仅为缩略提示。卷宗、名录、图录、报纸、评论和其它期刊引用信息仅在正文中标明，不计入书末列表中。

在此，我愿就书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向读者先行致歉。如您有任何线索或想法，请不吝赐教。我的邮箱是：info@oldchinaphotography.com。

最后，我对我的编辑安瑟尼·佩恩（Anthony Payne）与林赛·斯图尔特（Lindsey Stewart）献上一份特别的谢意。在繁琐的编辑工作中，佩恩先生帮助核实引用文献，还发现了一些新的信息，成为本书内容的有益补充。林赛女士则是19世纪摄影的研究权威，她在本书成稿过程中建言献策，使行文得到了完善。

泰瑞·贝内特
2010年11月



致 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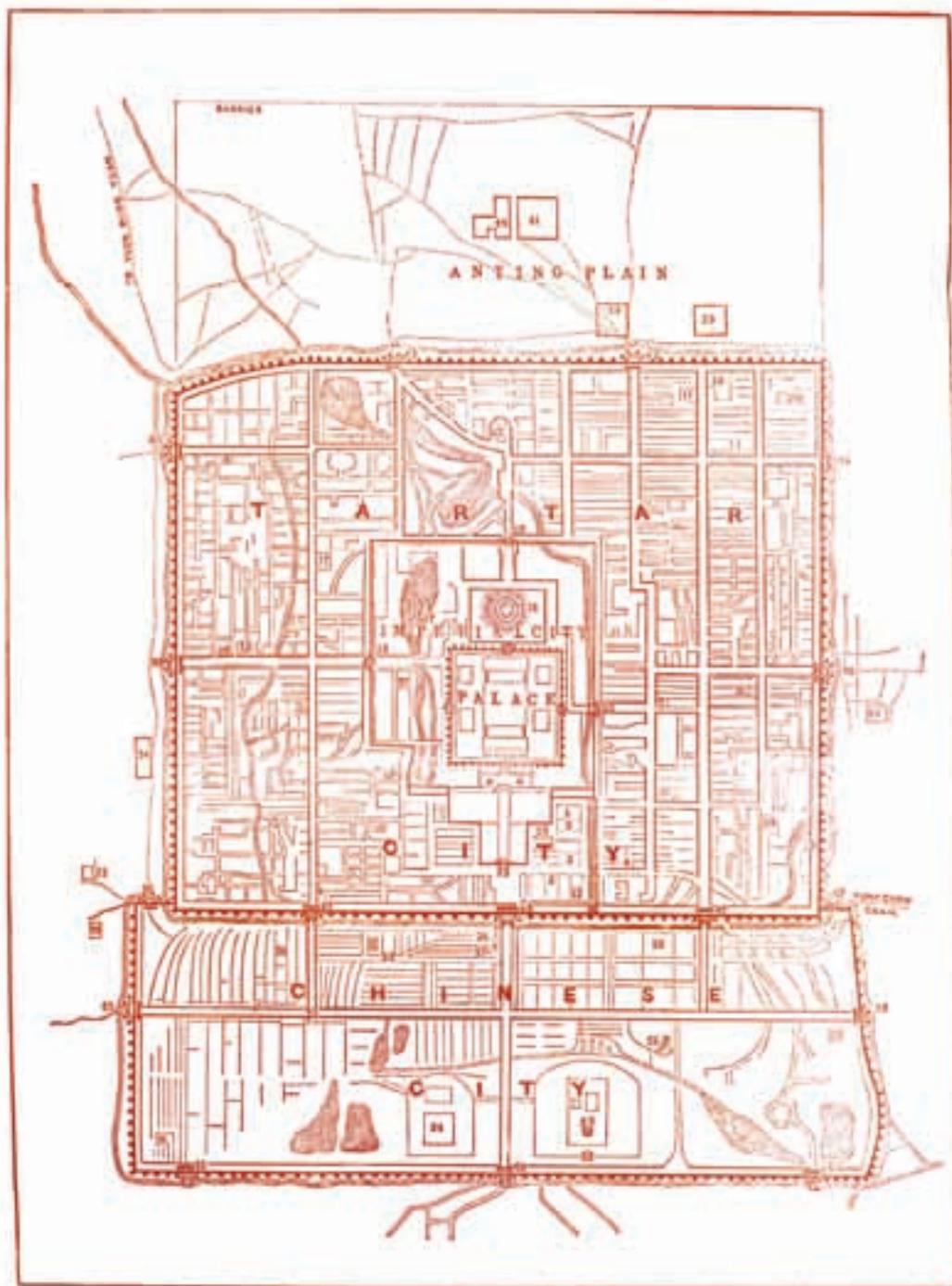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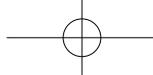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以下诸位为本书写作提供了多方帮助。如果没有他们，本书无疑会逊色不少。在此一并感谢：Lambert van der Aalsvoort, Simon Beattie, Alexander Boguslawski, Nuno Borges de Araujo, Sandy Barrie, Robert Bickers, Jeremy Bigwood, Carolynn Boucher, Alex Byrne, 陈申, Peter Collingridge, Patrick Conner, Denise Cusick, Daniella Dangoor, Liza Daum; Douglas Fix, Guillaume Garnier, Jerome Ghesquiere, Barbara Giordana, Michael Gray, 古峰, Arthur Hacker, Violet Hamilton, Stefan Handle.

Sylvie Henguely, Peter Hibbard, John & Judith Hillelson, Matthew Isenburg, Ken Jacobson, Serge Kakou, Valeriy Krestyaninov, 黎健强, Haiwei Li, Jacqueline Martinet, Herman Moeshart, Oliver Moore, Gael Newton, Joann Nicholls, Rob Oechsle, Robert O' Hara, Nick Pearce, Christian Polak, Mike Price, Michael Pritchard, Rob Randall, Bob Richards, Howard Ricketts, Marcel Safier, Erika Sanger, William Schupbach, Suzanne Schwarzwald, Eileen Scully, Carl Smith, Ed Stokes, 仝冰雪, Frances Terpak, Jonathan Wattis, Young-tsu Wong, Clark Worswick, Roberta Wue, Vania Zouravlio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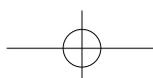
图片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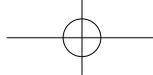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Authors' Collection; Bernard Quaritch Ltd; C. von der Burg Collection; Daniella Dangoor; Gu Feng Collection, China; Guimet Museum, Paris; Thomas Hahn Collection; Matthew R. Isenburg; Garnet Publishing; Getty Images;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Gilman Collection;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and Tilden Foundations; 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 Old Japan Picture Library; Royal Asiatic Society, London; Royal Engineers Museum, Gillingham;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Paris; Lisa Tao Collection; Wilson Centre for Photography.



北京城区示意图，摘自德尼克 (N.B.Dennys) 《中日通商口岸》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1867年。





引 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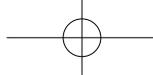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本卷从《中国摄影史：1842—1860》的末尾说起：1861年，弥尔顿·米勒和查尔斯·韦德是在华活动的最重要的两位西方摄影师。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中国与西方商人、外交官、传教士的关系趋于缓和，双方基本相安无事。之所以用“基本”二字，是因为始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尚在进行、且愈演愈烈之故，至1864年方告结束。

在本书所涉及的年代，尽管清廷已停止与英法联军交战并集中全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但各地战斗仍在持续。清廷甚至不惜求助于外夷，组建由美国军官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及其继任者英国军官戈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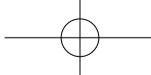
（Charles Gordon）所率领的“常胜军”，以打击太平军。（戈登因苏丹喀土穆之役而名载战争史册，但最为人称道的却是为清廷效命的这段经历，他也因此得名“中国的戈登”。）

1861年，太平军进攻上海。老城危如累卵，城内的摄影师们想必也人心惶惶。其它通商口岸也并不太平，只有英属香港岛相对平静。

此时，受战争影响，摄影在中国发展相对缓慢。直到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上海和香港的全天候照相馆的生意才逐步回暖。这时，米勒和韦德已相继返回美国，新一代的摄影师正跃跃欲试，想在中国一展拳脚。



香港示意图，摘自德尼克《中日通商口岸》，1867年。



第一章 香港照相馆

引 论

1861年初，几千名英法联军士兵北上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南方沿海商埠的照相馆生意转淡，整个行业突然变得萧条起来。趁此间隙，原在香港谋生的美国摄影师韦德和霍华德把香港的生意留给米尔顿·米勒打理，转而去广州和上海探路，开辟新的临时分店。留守的米勒既是摄影师，又是临时掌柜，每日应对，游刃有余。此时中国局势不稳，他们三人的未来亦充满了变数。

1861年9月，韦德返回美国，霍华德大概也随之而去。这半年间的人事变迁、生意盈亏，终究如何，我们已无从得知。临行前，大约在8月间，他们已把会照相的英国士兵查尔斯·帕克收编麾下。自9月起，米勒成为新开张的“韦德与霍华德”照相馆广州分号的大掌柜，可能还同时打理着香港老店的业务。1863年年初，帕克离开中国前往日本——至于在离开中国前，他自己是否也开办过照相馆，我们不得而知。（关于这四位摄影师的具体活动，请参见《中国摄影史：1842—1860》相关内容。）

1861年年末至1862年年末，米勒与帕克可能是香港仅有的两位知名知姓的西方商业摄影师。米勒往返于香港、广州两地，足迹并不局限于香港。不过他们二人并未垄断香港的照相业，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市场上至少还另有三家照相馆，只是经营时间都不长。这三家中，最早的一家可能为G.E.培特（G.E.Petter）开办。他曾在1861年8月7日的《德臣西报》上刊发如下广告：

照相馆

皇后大街东路415号

香港联合船坞对面

G.E.培特公司敬禀：本照相馆即日开业。

拍摄肖像、风景，售立体镜、相纸或玻璃材料。

版画制作，油画，照片等等。

售相机、镜头、显影药品、三脚架、镜框、玻璃版、蛋白相纸、摩洛哥镜匣、药品及一切所需，以资艺术创作，设备精良，价格公道。

另有诸项操作辅导。

提供照片负—正印制服务。

G.E.培特公司承诺企业永久经营，纸质人像底片可永久保存、编号，可随时加印。

香港

1861年8月7日

G.E.培特大约在1861年六七月间抵港。1861年8月15日，《伦敦与中国电讯报》曾刊登过他的抵港信息。遗憾的是，培特在英国的摄影资料中均未有记载，迄今也没有照片能被断定是他的作品。他在港期间最后一则广告刊发于1861年10月17日，与首则广告相距两个月。

丁摩尔兄弟（Dinmore Brothers）也在香港经营着一家照相馆。丁氏在1864年间曾于上海开办过一家照相馆，一般认为，他们的活动仅限于上海。但最近发现的一张名片小照纸托背面有丁氏香港照相馆的钤印，且标着时间“1861年”，这就把他们的经营时间又向后推了



图1.1 佚名。香港港口，约1875年。三联蛋白全景照片。作者收藏。

几年，地点范围也随即扩大。至于这家丁氏香港照相馆具体经营了多久，我们已无从考证，只能先粗略估计到1863年。

同一时期，另有法国摄影师J.达尔马·拉格尼埃（J. Dalmas Laguenière）在香港开办过一家照相馆，并被列入1862年的《中国名录》（*China Directory*）中。此人身份不详，作品迄今亦未曾面世。1860年12月11日，抵港人员名单中可查到一位“Lagarriere”先生（参见《北华捷报》，1860年12月25日，第30页）；1860年4月11日，从香港抵沪的人员名单中有一位“Lagarliere”先生（参见《北华捷报》，1860年4月21日，第62页）。此二人姓名拼法均与他类似，但是否是他本人，仍不能确定。

1863年，自帕克和米勒离开中国后，香港的照相业翻开了新的一页。韦德与米勒为香港的照相业建立了严格的准入门槛，他们之后，任何赴港谋生的西方摄影师都必须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同时再加上才华并付诸努力，否则无法立足。米勒走后，香港开张的第一家照相馆即由他的前任合作伙伴S.W.哈尔西（S.W.Halsey）开办。

S. W. 哈尔西

1864年1月5日，《香港孖刺西报》刊登了一家新照相馆的开业消息：

告白：米勒照相馆敬启香港居民，新照相馆业已开张，皇后大道68号，东藩汇理银行对面即是。各分号经营业务皆有增益，旧有货品亦有更新。房屋、风景、船舶、马匹与宠物咸可入照。服务迅捷，体贴周到。

S.W.哈尔西公司

香港

1864年1月4日

此后，哈尔西在同一报纸又刊发了第二则更详细的广告，从4月14日起一直刊发至6月9日：

照 相

启者新近购入韦德与霍华德照相馆、米勒照相馆之全部底片，承接如上两家照相馆所拍人物、合影等旧照翻印业务；香港、广州、澳门、北京、上海、福州之精美风景照，以及中国、日本人像一并代售。固有新近四五年内所拍中、日私人宅邸、公共建筑、船舶及其他内容照片，请赐阅。

照相馆置当今最先进之设备，工艺精湛，拍摄单人人像、合影、房屋、船舶、宠物等，广受认可，服务快捷，价格公道。

另出售各式相机、镜头和冲印原料。有自配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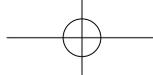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图1.2 S.W.哈尔西公司。“维多利亚港一瞥，香港。”依哈尔西公司照片所作版画。选自《伦敦新闻画报》，1866年5月5日。作者收藏。

化火棉胶、硝酸银溶剂等照相药剂，价格公道。

S.W.哈尔西公司，皇后大道

香港

1864年4月13日

哈尔西照相馆的另一条主要广告刊于1864年9月3日的《香港每日邮报》（*Hongkong Daily Press*）上：

照 相

S.W.哈尔西公司素蒙香港居民青睐，深以为谢。今迁至F.G.里德（F.G.Reed）公司原址，东藩汇理银行对面即是。拍摄肖像、合影，风格与欧洲无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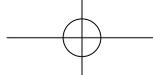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敝等日思精进，已将摄影室与等候室修葺一新，以期公众惠顾。售香港、广州、澳门，以及中、日其他各地风景照，特备香港等地着色照片，待君赏鉴。另售相机、镜头、药品各物，货源常备不断，以助摄影艺术之所需。

香港

1864年7月15日

哈尔西曾与米勒共事，又购得韦德与霍华德照相馆、米勒照相馆底片（从他刊登的广告看来，他还有可能收购了G.E.培特的照相馆），无论从经验上，还是拥有底片的规模上，在香港照相业的西方同行中都堪称霸主。能够与他竞争的中国同行可能只有日成照相馆与缤纶照相馆两家。然而，哈尔西照相馆究竟经营得如何，他用多大的资金规模去收购别人的底片，我们依然无从得知。《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在1866年5月曾刊登过一幅香港的全景木版画，并注明原照摄影师为哈尔西，遗憾的是，可确定由他拍摄的照片迄今仍未发现。

在1865年的《中国、日本、菲律宾纪事报及行业名录》（*Chronicle & Directory for China, Japan, Philippines etc*）中，可找到“S.W.哈尔西公司，照相，皇后大道”的登记信息。1865年中期，哈尔西的照相馆被西尔维拉（José Joaquim Alves Silveira）买下。西尔维拉于1864年和1865年间任香港陪审团成员，职业是“哈尔西照相馆店员”。除此之外，再无信息留下。哈尔西在香港行色匆匆，往来原因无从得知，生平背景也无从考证。在19世纪40年代，一个美国人在墨西哥开了家照相馆，也



姓“哈尔西”；1840年，在加拿大魁北克也有过一位同名摄影师。

西尔维拉（1840—1874）

据美国研究者卡尔·史密斯（Carl Smith）考证，西尔维拉1840年生于葡萄牙，1874年2月25日在香港去世（香港政府档案处，史密斯档案）。他在1864年加入哈尔西照相馆，任店员，1865年买下了该照相馆（及其底片）。据1865年7月18日《香港孖刺西报》记载：

敬启者：本馆已收购哈尔西照相馆，将延续其业务，维护经营所需，并添进新设备。拍摄风景和人像，风格雅致，技术先进，价格公道。承接各项拍照业务，定兢兢业业，快捷稳妥，不辜负公众信赖。另翻印人像，售中国各地景物照，随时服务。

西尔维拉照相馆
香港
1865年6月5日

1866年1月25日，西尔维拉继续在《香港孖刺西报》上刊发广告：

西尔维拉敬禀公众：敝公司新近购入冲印照片最新设备，自信服务堪比欧洲同行。名片小照等，先拍照，后付费，包君满意。

香港
1865年12月29日

1866年3月7日，他在《香港孖刺西报》又刊发了一条类似的广告：

精良照片

西尔维拉照相馆敬启公众注意：我馆新购入照片冲印之最新设备，自信拍摄人像堪比欧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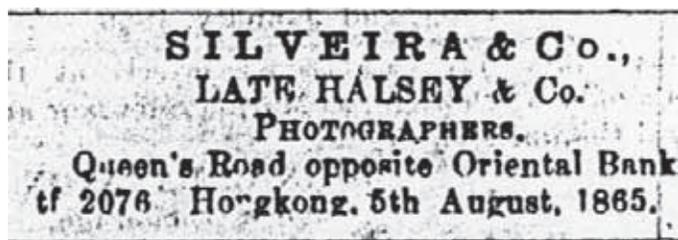


图1.3 1866年1月25日，西尔维拉照相馆刊发在《香港孖刺西报》上的广告影印件。作者收藏。

最佳者。

名片小照等，先拍照，后付费，包君满意。

另有大宗设备及化学药剂出售，价格公道，常备不断；售香港、广州、澳门及中国北方各种景物照。

香港
1866年2月6日

西尔维拉照相馆并无其他信息留下。1866年8月8日，《香港信使报》（*Hongkong Mercury*）曾简要报道该照相馆拍摄处决海盗一事。另据《德臣西报》报道（《伦敦与中国电讯报》转载，1867年4月5日，第182页），1867年2月23日，香港市政厅举行奠基仪式，西尔维拉照相馆拍摄了出席仪式的官员和各方宾客：

礼毕，摄影师西尔维拉携相机、预先备好之底片走上前来，曝光几秒，为台上嘉宾合影留念；随后，来宾行至休憩室，四十余人稍作休息、用餐，互祝贺词。

1867年初，西尔维拉将照相馆转卖给英国人威廉·弗洛伊德（William Floyd）。弗洛伊德于1874年2月去世，生前做过西尔维拉的助手。另据一幅阿芳照相馆的名片小照背后徽章所记，（赖）阿芳也曾在西尔维拉麾下效力。阿芳被公认为19世纪最重要的中国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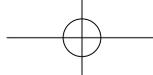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图1.4 西尔维拉照相馆，西方孩童（后有支撑物），约1865—1867年。蛋白名片小照，手工上色。作者收藏。



图1.5 西尔维拉照相馆所摄名片小照背面。作者收藏。

师。该名片小照背面写着：“阿芳，摄影师，原西尔维拉照相馆，香港皇后大街54号”。

威比金与凯恩斯（Wiebeking, Cearns & Co., 活跃于1866年）

摄影师威比金的活动情况曾见于1865年的《中国名录》。《名录》载：“E.威比金，摄影师，斯坦利街。”1866年初，威比金与凯恩斯开始搭档。1866年1月4日，《香港孖刺西报》刊登如下广告：

敬等敬启香港淑媛、绅士：敝所开在中环皇后大道111号，为香港唯一欧人所办照相馆。恳请惠顾。

服务皆循欧洲惯例。营业时间另行通知。

威比金、凯恩斯等。

香港

1865年12月28日

爱德华·A·威比金（Edward A. Wiebeking）与W.G.凯恩斯（W. G. Cearns）的合作时间很短。据《香港孖刺西报》所刊广告，他们的照相馆于1866年2月初开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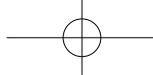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图1.6 威廉·P·弗洛伊德，澳门全景，1872—1873年。六联张蛋白全景照片，底片标号。作者收藏。

威比金与凯恩斯照相馆，位于皇后大道111号，斯泰格酒店（Stag Hotel）对面。——1866年2月2日。

但仅仅两个月后，3月26日，《香港孖刺西报》就报道了二人合作解体的消息，并声明威比金将负责承担后续债务，办公地点在皇后大道111号不变。威比金单枪匹马，继续经营，1866年6月2日，在《香港信使和航运报》（*Hongkong Mercury & Shipping Gazette*）上刊发了如下广告：

E.A.威比金照相馆
朝九点至晚五点
皇后大道111号
斯泰格酒店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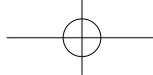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广告刊发一个月后，威比金出现债务危机，不得不变卖资产。7月19日，他在《香港信使和航运报》上刊登拍卖公告，所售物品包含“两台相机（崭新）、配药品、暗房器皿、玻璃底片”及私人生活物品。（参见伍美华、黎健强、卫周安编著《拍摄香港》，1997年出版，第30页。）威比金入不敷出，第二天，香港高级

法院宣布其破产（参见1866年7月24日《香港孖刺西报》），债务由当时已担任斯泰格酒店经理的凯恩斯偿付（参见1866年8月31日《香港孖刺西报》）。威比金与凯恩斯照相馆无照片传世，两位摄影师个人亦无作品流传。

马西阿诺·安东尼奥·巴普蒂斯塔（Marciano Antonio Baptista, 1826—1896）

葡萄牙人巴普蒂斯塔是一位天资卓越的画家，在澳门期间，曾师从于著名的英籍画师乔治·钦纳里（George Chinnery）。钦纳里于1825年抵达澳门，客居此地，直至1852年离世。巴普蒂斯塔有水彩画传世，澳门艺术博物馆与香港艺术博物馆都有收藏。他在澳门出生，是海员后代，后移居香港，本想以绘画为生，无奈生活所迫，不得不改行照相，为香港业余戏剧协会（*Hongkong Amateur Dramatic Society*）服务，拍摄人像，兼画背景布。

巴普蒂斯塔从事照相活动的具体时间不详。唯一已知信息是他在1866年变卖了自己的照相器材。据1866年8月11日《香港信使和航运报》载，他出售的物品包括：“三台相机，大小号各式镜头，照相必备化学药



品等等。全套物品几近全新，售370美金。”巴普蒂斯塔还承诺免费为买家提供一个月的速成培训。遗憾的是，直至1866年12月，该报纸倒闭，广告似乎仍无人问津。（参见伍美华、黎健强、卫周安编著《拍摄香港》，第30页。克拉克·沃斯维克 [Clark Worthwick] 曾提到，巴普蒂斯塔的家谱上说，他的专职工作是为中国达官显贵拍摄遗像。）

巴普蒂斯塔之妻名叫玛利亚·约瑟芬 (Maria Josepha)，两人可能是在澳门成婚。19世纪50年代末，夫妻二人移居香港，育有子女11人。1857年3月28日，《伦敦新闻画报》刊载了几幅巴普蒂斯塔的绘画作品，并提及作者是“葡萄牙人巴普蒂斯塔：精明的艺术家，钦纳里的学生”。1857年9月3日的《德臣西报》也推荐了他的作品，对他进行了相同的介绍。同年，巴普蒂斯塔曾登广告，出售“香港、澳门等地风景画，钦纳里作品复制件，及其素描原件。”（参见卡尔·史密斯通信，原载于1974年6月15日《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帕德里克·康纳 [Patrick Conner]，《马西阿诺·巴普蒂斯塔》，马丁·格里高利画廊 [Martyn Gregory Gallery]，1990年展览图录第55号；以及《乔治·钦纳里》，1993年出版，第280—28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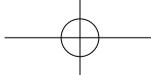
1869年的《中国、日本、菲律宾等地纪事报及行业

名录》曾收录一则关于“M.巴普蒂斯塔”的信息，职业为《中国杂志》(China Magazine)的照相制版员。此人很可能正是巴普蒂斯塔。遗憾的是，随后的《名录》上再无有关他的信息出现。1896年，巴普蒂斯塔在香港去世。同年12月19日，《香港孖刺西报》刊登了一则简短的讣告。

威廉·普赖尔·弗洛伊德 (William Pryor Floyd, 1834—约1900)

威廉·弗洛伊德的在华摄影生涯很长，拍摄了很多高水准的作品，成绩斐然。他还开过一家照相馆，在远东声名远扬。19世纪80年代，香港的照相行里，他曾是约翰·汤姆逊的主要竞争对手。今天，弗洛伊德的摄影作品在世界各地均有收藏，比如美国马萨诸塞的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就藏有一本他的相册。我们对他的职业生涯和商业活动比较了解，但对他的私人生活和履历背景知道的就相对少些。

弗洛伊德1834年出生于英国康沃尔郡的费拉克地区，双亲约翰·弗洛伊德 (John Floyd, 1797—1867) 与伊丽莎白·普赖尔 (Elizabeth Pryor, 1800—1848) 于1823年7月成婚。1841年费拉克地区人口统计中记载，



夫妇二人共有子女6人，威廉排行倒数第二。约翰在当地经营一家旅馆，该旅馆在今天仍然营业，原名为“血桶”（Bucket of Blood），后更名为“新旅店”（New Inn）；他还持有附近黑尔港口（Hayle）两艘纵帆船“玛利亚号”与“贝奇号”的大宗股份。在1851年人口统计时，约翰的职业为“旅店老板”。弗洛伊德当时17岁，尚在家中居住。

随后的十多年里，弗洛伊德的情况不详。直至1864年，他的名字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日本、菲律宾等地纪事报及行业名录》中，职业是上海香浓照相馆（Shanghai Studio of R.Shannon & Co.）的摄影助理。1865年，该名录继续刊发了同样的信息。但在1866年，弗洛伊德的名字突然出现在宁波外侨人名单中，具体职业不详。据1866年1月25日的《香港孖刺西报》报道，他曾在1865年迁至澳门，并开办了一家照相馆，遗憾的是该照相馆在第二年失火被毁。《香港孖刺西报》报道如下：

澳门火事——今收悉澳门弗洛伊德照相馆失火报告。当事人云：“周五清晨八点半左右，两名中国人抵我馆，于西侧等候室窗边攀谈；一人上前，与我谈到学习拍照并购买器材之事，另一人仍在窗边等候。邀前人入内，商定成交细节，在午后两点半左右谈妥价格。不多久，我正在旁边旅店中喝咖啡，照相馆突然起火，火事恰从西侧等候室窗边蔓延开来。一刻钟内，整座建筑开始着火，火势愈演愈烈。我忙跑进照相馆，只抢救出一台相机，旁边的椅子和脚踏台面已不幸失火。除这台相机及少量存在旅店的化学药品外，其余设备均付之一炬。这些设备在中国买不到，损失也无法估量。”

弗洛伊德在大火中可能失去了全部的底片，并且，照相馆可能并没有投保火险。不过他很快就就在澳门重新开业了。1866年8月25日，弗洛伊德在《香港孖刺西报》上发布如下广告：

照相

敬启澳门游客：鄙人拍摄肖像，裱于卡纸上，技艺超绝。

有意者敬请前来洽谈。香港顾客有代理专门伺候，照片可寄至香港各处，货到付款，一打4美金，3打9美金。此价格包含底片。底片随信一并寄出。

W.P.弗洛伊德
照相艺术家
澳门南湾大码头
1866年8月6日

1866年时，澳门已繁华不再，比之香港，已如静水一潭，只有在夏季，才迎来一些香港的避暑游客。这些人就是弗洛伊德广告针对的目标顾客。弗洛伊德的照相馆开在澳门，但广告却登在香港报纸上，可能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弗洛伊德并未在澳门停留太久。在1866年年末至1867年年初的这段时间中，他加盟了香港的西尔维拉照相馆，并很快反客为主，成为该照相馆的所有人，雇佣西尔维拉为其效力。1867年3月25日，他在《德臣西报》上刊登了如下广告：

W.P.弗洛伊德，照相艺术家，接管原西尔维拉照相馆。新照相馆近期开张。香港中环皇后大道62号，渣打银行对面，原西尔维拉照相馆向西第四家店铺即是。3月24日。

据1867年4月2日《德臣西报》所载广告，弗洛伊德所开照相馆名为“辉来影相”[译者注：即“维多利亚照相馆”，Victoria Photographic Gallery]，地点在中环皇后大道62号。另据5月8日《香港孖刺西报》载，照相馆于4月8日开张。至此，弗洛伊德终于在香港有了一席之地，他唯一的竞争对手可能就是美国韦德兄弟所开办的照相馆（参见《中国摄影史：1842—1860》）。而在华人圈内，照相业也正稳步发展，其中最能对弗洛伊德构成威胁的，恐怕非缤纶照相馆莫属。另一位重要的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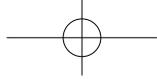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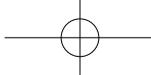


图1.7 威廉·P·弗洛伊德，“辉来影相”，1867年左右。图为位于香港中环皇后大街62号的弗洛伊德所经营的照相馆。伦敦皇家亚洲协会收藏。



摄影师阿芳的照相馆在此时也已开张。

“辉来影相”开业不久，弗洛伊德便迎来了一位中国客人，想向他购买一台相机和镜头。1867年4月24日，弗洛伊德曾与香港托马斯·亨特公司（Thomas Hunt & Co.）的商人约翰·马丁·阿姆斯特朗（John Martin Armstrong）谈及此事，二人信札尚存（参见剑桥大学图书馆，怡和洋行档案，信札第8833号。信中提到的“韦德先生”可能正是美国摄影师查尔斯·韦德）：

阁下，

韦德先生昨日前来，欲购药品若干，不含相机。今日，一中国人前来我处，欲购一相机并镜头。我嘱他下午再来，届时看货议价。您不妨将相机与镜头先行送至我处，将最低价告之我等，如能售出，我等将收取少量服务费，如未能售出，明日一早定原物归还。

W.P.弗洛伊德拜言

1867年年末，弗洛伊德出现在香港最高法院的被告席上，《德臣西报》在1867年9月3日报道：

原告W.R.布里斯托（W.R.Bristow）诉被告W.P.弗洛伊德（W.P.Floyd）赔偿其住宿费82.50美金整。去年11月、12月间，被告曾与原告在澳门所开旅馆内投宿。被告在该旅馆共住19天，但其中4天前往香港故仅支付了15天住宿费。原告认为，无论被告是否在该旅馆居住，都应支付19天的住宿费。被告则认为，这一要求违背了他在中国16年来的生活常识。法官出面调停，但原告坚持被告应支付22美金，被告则拒付此费用。双方据理力争，辩论中，牵扯出更多细节，及被告“非法卖酒”之事。最终，法庭判被告赔偿原告27.50美金整，并同时宣判，今后房客一旦在旅店预定房间，且旅店在事实上已为房客保留房间，则不管房客是否使用房间，都必须按规定房价支付费用。

这则经济纠纷显然发生在弗洛伊德把照相馆的生意从澳门迁往香港之前的这段时间内。报道提到他“已在中国居住了16年”，这个信息很关键。然而，此前的中国贸易名录等档案中并未有其名字出现。弗洛伊德在1851年至1864年间的去向仍待核实。

弗洛伊德试图在香港站稳脚跟。1868年2月，他终于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名竞争对手：雄心勃勃、天资卓越的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此后的两年中，双方为竞争照相业的第一把交椅展开了拉锯战。弗洛伊德似乎笑到了最后，但在恶性价格战（中国人开办的缤纶照相馆也卷入其中）中元气大伤。虽然大多数香港顾客认为，汤姆逊在才华上更胜一筹，然而在耐久力和坚持不懈这一点上，弗洛伊德似乎更占上风。价格战期间，弗洛伊德在当地报纸上刊发了一系列广告。通过这些广告，我们可以对他的技术水平、吸引顾客的战术方法略见一斑。

1868年4月2日，《每日广告与船务公报》（*Daily Advertiser and Shipping Gazette*）上刊发了一则广告，“弗洛伊德所摄中国与日本写真”相册一套含55张照片售价20美金，另有同名相册含24张照片售价18美金。（通过这则广告我们首度得知，弗洛伊德也曾拍摄过日本风景。不妨暂且认为这部分照片为他亲自拍摄，而非转购他人作品。）广告刊出不到一个月，两套相册分别降价到18美金和12美金。此后不到两周，1868年4月13日，弗洛伊德又在《德臣西报》刊发了另外一则广告，称自己拍摄的卡片人像已达到“一级”水平，“成像耐久”，“在华摄影师未有出其右者”。1868年5月，他与汤姆逊的价格战趋于白热化。5月22日，弗洛伊德在《德臣西报》又抛出如下广告：

售香港等地风景照片

辉来影相现售香港、澳门、广州、厦门、汕头与福州各处风景一套，分上下两辑。照片为最新光学器材所摄，用当今一流镜头，拍摄视角可达100°，三倍于东亚旅居摄影师常用镜头视角，可径直拍摄全景照片，无需拼接。敝馆现特降价，每



图1.8 威廉·P·弗洛伊德，“香港太平山——华界”，1868年左右。作者收藏。

张照片仅售50美分（此价格仅对订户有效）。

订货者请与敝馆联系，至我处选片看样，如有特殊要求，亦可前来商谈。

香港

1868年5月21日

这则广告肯定让汤姆逊和弗洛伊德的其他竞争对手不悦。弗洛伊德出售的宽幅中国照片是用新近发明的广角镜头（“达梅耶与罗斯”牌 [Dallmeyer and Ross]）拍摄的，画面非常有吸引力。他试图通过“征订”和降价50%的方式建立起牢固的客户群。1868年5月23日，《德臣西报》对他拍摄的这些宽幅照片作出了很高的

评价。

弗洛伊德继续在《德臣西报》上打价格战，表现得相当活跃。1868年6月22日，他发布了一条广告，标题为“商场就是战场!!!”，火药味十足；同时，宣布他的“辉来影相”将名片小照的价格从一打5美金降为3美金，并在香港报纸上继续造势：1868年6月22日的《香港孖刺西报》和1868年8月8日的《德臣西报》再度对他进行了有利的宣传（参见附录4）。同年9月，汤姆逊也宣布降价。弗洛伊德立即作出回应：他在《香港孖刺西报》迅速刊发了如下广告（广告落款日期为9月21日，见于10月21日的报纸，首发日期很可能在10月21日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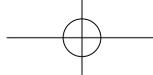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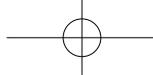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图1.9 威廉·P·弗洛伊德，“香港东港的瀑布与小桥”，1868年左右。照片编号71。作者收藏。



图1.10 威廉·P·弗洛伊德，“香港的瀑布”，1868年左右。作者收藏。



告 白

今有香港、广州、澳门等地风景照及特色人像待售，合计约150余张，请自选。

一套50张（已裱） 售价30美金

半套25张（已裱） 售价20美金

一套50张（未裱） 售价25美金

半套25张（未裱） 售价15美金

辉来影相

香港

1868年9月21日

随后几个月中，弗洛伊德频发广告，宣布照相馆将由皇后大道中迁至云咸街与惠灵顿街转角。如1869年5月25日的《德臣西报》广告云：

告 白

敝馆敬启公众：兹定于6月1日起暂停拍摄肖像卡片照，迁至云咸街与惠灵顿街转角、阿提可（atick）裁缝铺对面。敝馆日常业务自6月起在新址继续进行。

W. P. 弗洛伊德

香港

1869年5月24日

似乎为了显摆自己在香港人脉广泛，1870年5月13日，弗洛伊德在《香港孖刺西报》上发布了如下广告（广告落款日期为1869年8月9日，首发日期很可能早于1870年5月13日），声明香港总督将亲自参加照相馆新址的启用仪式：

蒙港督麦当奴阁下与夫人恩顾

W.P.弗洛伊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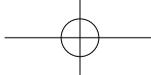
敬启公众：港督R.G.麦当奴（Macdonell）阁下与夫人将亲莅照相馆，为新馆揭幕。敝人经营东亚最精良之照相馆，地点在云咸街与惠灵顿街转角，恳请惠顾。



图1.11 威廉·P.弗洛伊德，“香港美最时洋行”，1868年左右。底片含签名，照相馆印刷标签编号11。作者收藏。



图1.12 威廉·P.弗洛伊德，“香港佑宁堂”，1868年左右。底片编号23。作者收藏。



真人等大肖像照片，上油彩或水彩色。

香港

1869年8月9日

W.P.弗洛伊德

香港

1870年10月29日

据1870年出版的《中国、日本、菲律宾等地纪事报及行业名录》，弗洛伊德照相馆仍在上述地址经营，经营者还有原照相馆所有人西尔维拉。此时，弗洛伊德已离乡多年。据殖民地办公室档案记录，他远在英国的家人正试图寻找他的下落（英国国家档案馆，ref: CO 129/146）。他们曾联系过西康沃尔（West Cornwall）的约翰·圣·奥比恩议员（MP John St. Aubyn），并曾在1870年8月7日致信时任殖民大臣的金伯利伯爵（Kimberley），恳请其帮忙打听弗洛伊德的情况。金伯利受人之托，致信香港总督办公室。1870年10月6日，香港副总督、H.W.怀特菲尔德（H.W. Whitefield）少将回复如下：

大人，

特命函第20号已于8月19日收悉。按您吩咐，关于西康沃尔的约翰·圣·奥比恩议员所嘱打听威廉·普赖尔·弗洛伊德先生下落一事，已有着落。弗洛伊德在香港以照相为生，生意蓬勃、业绩突出。与家人久失联系，他也自觉亏欠万分。

为您效力，仆荣幸之至。

H.W.怀特菲尔德 敬上

在1870年10月29日，辉来照相馆再次降价。关于这次降价，最早的文献记录是1871年5月25日《德臣西报》上的一则广告：

照 相

降价表

名片小照，3打7美金

同上，全身，3打6美金

同上，儿童，每打5美金

香港风景等等。备价目表供垂询。当今最耐久之照片。

弗洛伊德还组织了一系列照片抽奖活动，在《德臣西报》上继续刊发广告：第六期（1870年12月）抽奖广告刊发在1870年11月17日的报纸上，第九期（1873年12月）刊发在当年11月22的报纸上（参见伍美华、黎健强、卫周安编著《拍摄香港》，第56页）。与其说这种抽奖活动是成功的市场行为，不如说是销售压力所迫。弗洛伊德可能在这时已开始计划全身而退了。一年后，他在1871年12月11日的《德臣西报》上宣布出售自己的照相馆：

照相馆折价转让

此东方信誉最佳、库存最大之照相馆。售各式相机以备各种拍照之所需。风景、人像与合影所用各种镜头，罗斯、达梅耶与哈里逊（Harrison）牌皆备。同时转卖影室家具及各式一流办公必备物品。另附千张底片。

有意者请联系：

W.P.弗洛伊德

云咸街与惠灵顿街转角，香港

1871年12月11日

弗洛伊德在广告里自称经营着“东方规模最大之照相馆”，我们不妨姑且信之。早在1869年8月9日，他就曾发布一则广告，声称自己的照相馆是“远东最佳之照相馆”，并特意感谢香港总督的资助。如前文所述，1870年10月，香港副总督在信中也曾提到他“在香港以照相为生，生意蓬勃、业绩突出”。弗洛伊德在香港的这几年中事业的确非常辉煌。此时，31岁的他已萌生退意。1872年2月12日，《德臣西报》刊发了他的如下声明：

此照相馆——歇业

敬启者：自5月1日起，照相馆停止拍摄人



图1.13 威廉·P·弗洛伊德，“中国仕女”，约1872年左右。蛋白印相法制名片小照。作者收藏。



图1.15 威廉·P·弗洛伊德，“中国瓦匠”，中国香港，1868年。蛋白印相法制名片小照。作者收藏。



图1.14 威廉·P·弗洛伊德，图1.13照片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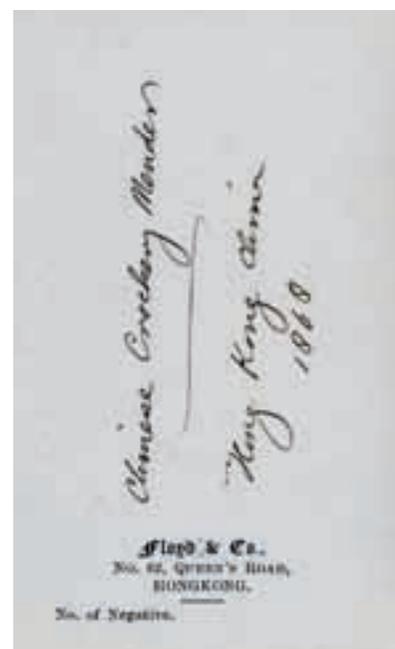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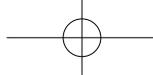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图1.16 威廉·P·弗洛伊德，图1.15照片背面。



像。昔所拍照片，先生、女士们如有加印需要，可前来订购。3打5美金，附赠全部底片。

W.P.弗洛伊德

香港

1871年12月11日



图1.17 威廉·P.弗洛伊德。“中国仕女”，约1870年。蛋白印相法制名片小照。作者收藏。

弗洛伊德可能并不想完全停止经营。中国人开办的照相馆在外侨中越来越成气候，人像生意竞争越发激烈，他可能只打算放弃这部分业务，把精力放在风景照片的销售上。但不管出于何种考虑，1872年4月29日，他在《德臣西报》上宣布照相馆开张延期一个月：

歇业

3打名片小照5美金

自5月1日至31日，以上价格另附赠底片。敝馆预计在6月1日起停止拍摄人像。

W.P.弗洛伊德

香港

1872年4月29日

弗洛伊德意在退出人像市场。1872年6月27日，他在《香港孖刺西报》刊发了一则启事，声明要变卖其人像照相馆和相关不动产：

拍卖——家具等

泰兴洋行现公开拍卖辉来照相馆全部家具。云咸街，W.P.弗洛伊德处。拍卖在今日，1872年6月27日中午。售：淡红锦缎座椅与沙发、茶几、钢琴、脚踏式风琴、镜子、版画、窗帘、地毯、餐桌、橱柜、陶器、玻璃器皿、床架、衣柜、盥盆架。

同时有售：

大量摄影器材。等等。

拍卖图录即将分发。

成交规则：请以墨西哥元交割。物品若有残次，请事先检查，落锤成交，无可更改。

香港

1872年6月20日

这场拍卖结束后，1872年7月2日，《德臣西报》上刊登了辉来照相馆易主的公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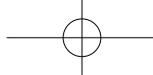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图1.18 威廉·P·弗洛伊德，“广州全景”，1870年左右。照片钤印标签上书编号“33”。作者收藏。

搬迁告白

香港影相楼 (Hongkong Photographic Rooms) 今日迁至原W.P.弗洛伊德照相馆处，地址在云咸街与惠灵顿街转角不变。

每日上午10时至下午3时营业。

E.瑞斯菲尔德

香港

1872年7月2日

1872年9月3日，弗洛伊德在《德臣西报》刊发如下告示：

照相

弗洛伊德敬启广大顾客：近日发售一套全新中国南方风景照片，11月计划发售一套日本风景照。昔所拍照片，先生、女士们如有加印需要，可前来订购。云咸街（新建）运动场旁即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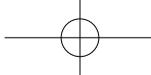
告白

J.J.A.DA西尔维拉先生将在我暂时离港期间全权负责各项经营事宜。

W.P.弗洛伊德

香港

1872年9月2日



据此看来，弗洛伊德将照相馆一分为二，把人像业务转手他人，但仍保留部分底片，向老顾客继续兜售（尽管问津者可能寥寥）。他似乎已将精力放在中国与日本风景照上，让新分家的照相馆进行销售，自己则动身去日本拍摄照片。几个月后，11月13日，《德臣西报》刊发了他的新照相馆的广告：

照 相
弗洛伊德氏新照相馆
于14日周四开张
云咸街运动馆旁即是。

香港
1872年11月11日

弗洛伊德依旧活跃在香港的照相业中，但外界大多以为他已将生意转售给E.瑞斯菲尔德（E. Rusfeldt,也写作“Riisfeldt”）。为破除此谣言的不良影响，1872年11月30日，他在《德臣西报》上刊发如下声明：

辟 谣

今人多误以为我已将生意转给E.瑞斯菲尔德先生。特此辟谣。

W.P.弗洛伊德
香港
1872年11月29日

如上所述，特此澄清，弗洛伊德先生未将其生意转售于我，仅将房屋托付于我义务看管。

E.瑞斯菲尔德
香港
1872年11月29日

1873年，依《香港陪审团人名单》（香港政府档案处）所载，西尔维拉为云咸街弗洛伊德照相馆之助理。1873年的《中国名录》亦收录弗洛伊德影室于其中，名为“维多利亚照相馆”[译者注：即“辉来影

相”]。同年，弗洛伊德在香港出版发行了《1873弗洛伊德之中国南方相册》（1983年10月27日，佳士得伦敦拍卖行曾卖出一本。拍品第142号。相册于1873年6月2日出版，内含50张照片，其中8张摄于日本）。1873年11月22日，《德臣西报》发布弗洛伊德照相馆第9期抽奖销售活动的消息。1874年，《中国名录》上，弗洛伊德照相馆的地址为“惠灵顿街”——据此看来，弗洛伊德照相馆在此期间可能另辟新址。1874年9月，弗洛伊德拍摄了香港遭受的台风袭击，这是他在香港的最后一次重要拍摄活动。此次所拍照片中有22张结集出版（美国密歇根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册）。

至此，弗洛伊德结束了在香港的拍摄，前往菲律宾筹建新的影室。据1875年、1877年出版的由冈萨雷斯（Gonzalez）与莫雷诺（Moreno）编撰的《菲律宾年鉴》[*Anuario Filipino*] 所载，弗洛伊德照相馆（误拼为“Floyel”与“Flويد”）所在地址为：“马尼拉，49（Calle）Sto.Cristo, Segunda。”（此处感谢麦克·普莱斯先生 [Mike Price] 提供线索）弗洛伊德在菲律宾停留时日不详。1898年，据亨利·斯特梅（Henry Sturme）所编《1898年摄影年鉴》（*Photography Annual for 1898*），有“W.P.弗洛伊德”在香港经营一间暗房。如果这位弗洛伊德是我们所追踪的弗洛伊德的话，他此时应该已是64岁高龄。最后，还有两则《望乡邮报》（*Homeward Mail*）上的线索不妨一提。据该报“往来客轮旅客名单”所载，1905年10月21日，驶向远东的“维多利亚号”上有一名“W.弗洛伊德”，该船于该月27日起航；1913年1月4日，“埃及号”上亦有一名“W.弗洛伊德”，该船于17日起航，从伦敦发往埃及赛德港。

弗洛伊德的最后岁月已湮没在历史深处，但在香港的这段经历已使他成为19世纪70年代远东最佳摄影师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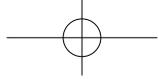


图1.19 威廉·P·弗洛伊德，“中国仕女”，约1870年。C·冯·德·伯格 (C.von der Burg) 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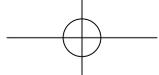


图1.20 威廉·P·弗洛伊德，“五层楼，旧堡垒，广州”，约1870年。照片钤印标签上书编号“34”。作者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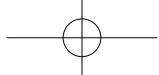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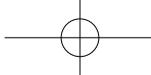


图1.21 威廉·P·弗洛伊德，“广州清真寺”，约1870年。照片钤印标签上书编号“32”。作者收藏。



香港影相楼与埃米尔·瑞斯菲尔德 (Hongkong Photographic Rooms and Emil Riisfeldt, 1846—1893)

埃米尔·瑞斯菲尔德的姓氏在香港广告中常写作“Rusfeldt”或“Rüsfeldt”，但其在澳大利亚工作时，均拼作“Riisfeldt”。本书中除引用原始文献保留原拼写外，其余皆以此拼法为准。

1872年4月19日，“香港影相楼”在《德臣西报》上首度亮相：

香港影相楼

(惠灵顿街与德己立街转角)

现在开业，早10时至午后4时，拍摄人像，
阴晴不限。

请注意：香港影相楼在《香港广告报》楼上。

E.瑞斯菲尔德

香港

1872年4月18日

1872年7月2日，《德臣西报》广告称，照相馆掌柜“E.瑞斯菲尔德”将铺面新迁至弗洛伊德照相馆原址：

搬迁告白

香港影相楼

即日起迁至原弗洛伊德照相馆处，地点在云
威街与惠灵顿街转角。

每日晨10时至午后4时营业。

E.瑞斯菲尔德

香港

1872年7月2日

1872年6月1日，由威廉·弗洛伊德开办的号称“东方最大之照相馆”曾宣布暂停人像拍摄业务。6月27日，弗洛伊德拍卖照相馆设备。据此广告看，买下弗洛伊德全部家当的人似乎就是瑞斯菲尔德。瑞斯菲尔德照相馆

建在弗洛伊德相馆原址上，并沿用其设备——二人想必进行了某些买卖交割。但至于弗洛伊德是否把底片也一并留给了瑞斯菲尔德，我们不敢肯定。此时弗洛伊德照相馆仍在营业，出售风景照片，且地址距此不远。并且，从已知的由瑞斯菲尔德所拍的照片看，并不存在从弗洛伊德购得底片的例证。如前所述，1872年11月29日，弗洛伊德还曾在当地报纸上辟谣，称自己并未将生意转卖给瑞斯菲尔德，后者只是在其照相馆旧址上营业而已。

1873年，瑞斯菲尔德在《中国名录》上刊登一则广告，详细说明了其拍摄内容和经营范畴。他不仅拍摄人像，还出售风景照，地点并不限于香港。

1871年10月18日，《德臣西报》上曾刊登一则广告，其中提到瑞斯菲尔德。这是他的名字首次在香港报纸上出现：

阿芳

摄影师

香港皇后大道54号

诚邀各界人士赏鉴福州、香港、广州、汕头、澳门风景照。

今与技艺卓越之艺术家埃米尔·瑞斯菲尔德先生合作，人像拍摄多仰仗瑞斯菲尔德扶持。

香港

1871年10月18日

据本节所引《德臣西报》1872年4月19日之广告，瑞斯菲尔德在此时已离开阿芳照相馆，另立门户。当年7月24日，他在同一家报纸上刊登如下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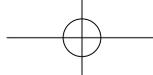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香港影相楼

云威街与惠灵顿街转角

(前弗洛伊德照相馆处)

照片与银版照片翻拍复制，可缩小、放大至任意大小。

照片可转印至陶瓷、乌木上，可上色。



HONGKONG PHOTOGRAPHIC ROOMS.

CORNER OF WYNDHAM AND WELLINGTON STREETS,

(The Premises lately occupied by Mr W. P. Floyd.)

COPIES TAKEN FROM

Photographs and Daguerreotypes,

ENLARGED OR DIMINISHED TO ANY SIZE
REQUIRED.

PHOTOGRAPHS TRANSFERRED TO PORCELAIN AND
IVORY, AND COLORED.

Sets of Views of Hongkong, Japan, Penang and Singapore.

FOR SALE.

Albums containing 25 and 50 Views,

Also,

For Cartes de Visite.

E. RIISFELDT.

图1.22 香港影相楼在《中国名录》上所刊广告，1873年。作者收藏。

风景照折价出售。

E.瑞斯菲尔德
香港

1872年7月23日

云咸街与惠灵顿街转角
香港

1872年7月22日

7月25日，《德臣西报》上刊登了另一则广告：

告白

17日总督府合影与18日司令总部合影现均可
供赏鉴，有意者请移步敝处订购。

另售柬埔寨国王肖像，大小不等。

E.瑞斯菲尔德
香港影相楼

1872年11月29日，《德臣西报》载：

告白

值圣诞之际，E.弗洛伊德首度发售“照片、
风景等”系列礼品照，12月19日午后4时起售。
每份5美金。如欲订购，请至香港影相楼洽谈，
云咸街与惠灵顿街转角即是。

香港

1872年11月2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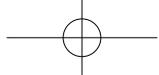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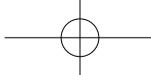


图1.23 香港影相楼在香港原址，1872—1873年。作者收藏。



瑞斯菲尔德的香港影相楼一直经营至1873年年末，随后转卖给“香港影相公司”（Hongkong Photographic Company）。再后来，瑞斯菲尔德离港，赴澳洲谋生。

埃米尔·瑞斯菲尔德1846年4月29日出生于丹麦腓特烈堡的赫尔辛格（教名为皮特·埃米尔·托瓦德，常称为“埃米尔”）。在丹麦人口记录中，他有兄弟两个，教名为威廉·阿尔弗雷德（Wilhelm Alfred, 1849—1932）和亨里克·瑞斯菲尔德（Henrik Riisfeldt, 1853—?）。1855年赫尔辛格人口普查时，兄弟三人与双亲约尔根（Jøgen）和弗雷德里克（Frederike）共同居住。瑞斯菲尔德的童年情况不详。据摄影学者桑迪·巴利（Sandy Barrie）考证，瑞斯菲尔德的澳大利亚后裔称，他在19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早期曾与阿尔弗雷德周游世界，而后才定居澳大利亚。（此线索由桑迪·巴利提供。作者在此谨表感谢。同时感谢奥尔·马蒂森 [Ole Madsen] 与马塞尔·赛菲尔 [Marcel Safier] 对瑞斯菲尔德丹麦家谱的考证。）

截至1871年10月，瑞斯菲尔德仍在香港活动，效力于经验丰富的中国摄影师阿芳。阿芳评价瑞斯菲尔德是“技艺卓越之艺术家”，据此看来，瑞斯菲尔德在抵港前应已从事过拍摄活动。瑞斯菲尔德曾在1873年的《中国纪事报与行业名录》及《中国名录》上刊发广告，出售“香港、日本、平壤及新加坡风景照”。其中不少照片估计都是在来港之前拍摄的。

瑞斯菲尔德最终离港赴澳洲。据《克里斯蒂安港》（Christianshaven）所载“旅客名单”，他于1873年12月从墨尔本乘船前往悉尼，一年后，与艾玛·派尔（Emma Pyle）成婚。婚后育有子女二人：小阿尔弗雷德（1875—1876）与夏洛琳（1880—约1956）（此信息由马塞尔·赛菲尔提供）。瑞斯菲尔德的兄弟——老阿尔弗雷德于1875年抵达悉尼剑桥郡。1874年，瑞斯菲尔德曾在墨尔本波尔克东大街122号开设了一家照相馆，1876年定居悉尼后，又开办了一系列照相馆（参见桑德《悉尼名录》[Sand's Sydney Directory] 与桑迪·巴利著《镜头后的澳大利亚人》[Australians Behind the Camera]，2002年出版，第160页）。瑞斯菲尔德还参加了1883—1884年在加尔各答召开的国际博览会。

1893年，埃米尔·瑞斯菲尔德在西南威尔士的新镇去世。据1930年大选登记名单上的信息，其女夏洛琳与其遗孀（当年去世）住在一起。夏洛琳终身未婚。瑞斯菲尔德已无后人健在。其兄弟阿尔弗雷德于1932年去世，子孙众多。桑迪·巴利曾对阿尔弗雷德后人进行访问，据他们讲，瑞斯菲尔德生前挥霍无度，死时还欠有债务。

埃米尔·弗洛伊德鲜有作品传世，我们对他的技术水平很难作出评价。笔者对现今被归为其名下的照片署名多有疑问。瑞斯菲尔德仅在香港停留了两年，且底片下落不明。他在澳大利亚期间所拍摄的人像照片数目众多，在私人 and 公共机构都有留存。豪斯曼与高德弗雷公司曾于1995年举办“中国城市旧影”（Old Photographs of Chinese Cities）展览并出版同名图录，其中几张香港照片被归为弗洛伊德名下。

香港影相公司，恩斯特·瓦塞尔与亨利·埃弗里特（Hongkong Photographic Company, Ernest Wassell and Henry Everitt, 1827—?）

在赴澳洲之前，埃米尔·瑞斯菲尔德将生意转卖给一位不知名的人士，后者将“香港影相楼”更名为“香港影相公司”。瑞斯菲尔德照相馆虽然只经营了几年，但口碑不错。接手人也乐得沿用旧称，未做太大改动。1874年1月17日，《香港孖刺西报》载：

香港影相公司

将于香港影相楼原址开业，云咸街与惠灵顿街转角、德国俱乐部斜对面即是。

格林亚尼号(s.s. 'gleanartney')抵港后即开张。

亨利·埃弗里特先生 (Henry Everitt) 之作在都柏林大博览会上广受赞誉，抵港后即刻备样品供客官赏鉴。

香港

1874年1月1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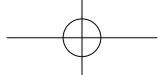


图1.24 (传) 香港影相楼, “中国客厅”, 约1872—1873年。作者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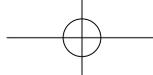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图1.25 香港影相楼，不知名的西方人士，约1872—1873年。蛋白印相名片小照。作者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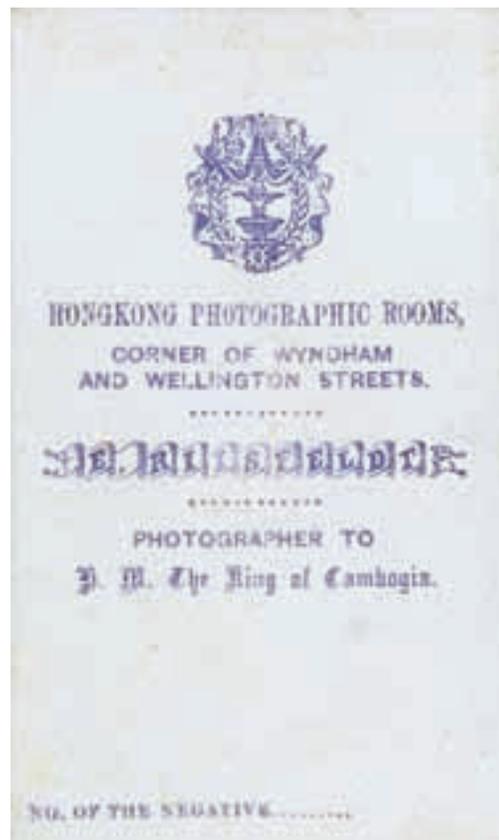


图1.26 香港影相楼，图1.25背面。

埃弗里特的照相馆在香港经营了三年。1877年1月2日，《香港孖刺西报》刊发了埃弗里特即将离港的消息：

香港影相楼

云咸街与惠灵顿街转角，德国俱乐部斜对面。

埃弗里特先生即将离港，贵客若有意拍摄人像，请速来我处。静候光临。

香港影相公司
香港
1877年1月2日

埃弗里特离港后，公司由恩斯特·瓦塞尔（Ernst Wassell）接手。1877年的《中国纪事报及行业名录》曾将其列在香港影相公司名下，职务为助理。1877年3月3日，《德臣西报》明确刊发了照相馆易主的消息：

恩斯特·瓦塞尔公司
照相师

敬启：即日起，于云咸街与惠灵顿街转角处起营照相业务，香港影相公司原址即是。

恩斯特·瓦塞尔
香港
1877年3月3日

香港照相馆 27

ADVERTISEMENTS.

HONGKONG PHOTOGRAPHIC COMPANY.

Corner of Wyndham and Wellington Streets.

(NEARLY OPPOSITE THE GERMAN CLUB)

OPEN DAILY, SATURDAYS EXCEPTED.

REDUCTION OF PRICES.

AFTER this Date and until further notice Prices will be as follows:—

Cameo Portraits,	{ if in one order }	for 1 doz.	\$4.00
Do.	do. " 2 "	7.00
"	" " 3 "	9.00
"	" " 5 "	12.00
Cabinet Portraits,	" " 1/2 "	5.00
"	" " 1 "	8.00
Portrait 8 X 6 plain,.....		each	6.00
" worked up and mounted.....		"	10.00
Enlargements made from any Photograph (faded or otherwise) colored in oil and framed complete,.....			25.00
Views from Negatives in Stock,.....			0.50
Do. Do. per doz.....			5.00

Out-door groups at private houses on Saturdays by arrangement.

Views of Private Houses & Grounds to order first copy,.....	\$10.00
Extra copies,	each 0.50
Patrons of the Hongkong Photographic Rooms can get their servants taken at first copy,	0.50
Extra copies, ..	0.25

N.B.—Suitable Colours for Dress are black, brown and green.

During the cold season the best light for portraiture is from 10 till 1,

Hongkong, December 7, 1874.

图1.27 香港影相公司在《中国名录》上所刊广告，1875年。作者收藏。

Hongkong Photographic Company

CORNER OF WYNDHAM AND WELLINGTON STREETS,

(Nearly opposite the German Club.)

OPEN DAILY, SATURDAYS EXCEPTED.

REDUCTION OF PRI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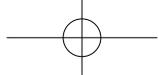
After this date and until further notice prices will be as follows:—

Cameo Portraits in one order for 1 dozen.....	\$4.00
" " 2 "	7.00
" " 3 "	9.00
" " 5 "	12.00
Cabinet Portraits in one order for 1/2 "	5.00
" " 1 "	8.00
Portraits 8 by 6 plain, each.....	6.00
" worked up and mounted.....	10.00
Enlargements made from any photograph (faded or otherwise) coloured in oil and framed complete.....	25.00
Views from any negatives in stock, each.....	0.50
" " " " per dozen.....	5.00
<i>Out door groups at private houses on Saturdays by arrangement.</i>	
Views of private houses and grounds to order, first copy.....	10.00
Extra Copies, each.....	0.50
Patrons (only) of the Hongkong Photographic Company can get their servants taken at first copy.....	0.50
Extra Copies, each.....	0.25

N.B.—Suitable Colours for dress are Black, Brown, and Green.

During the Cold Season the best light for portraiture is from Ten till One.

图1.28 香港影相公司在《中国、日本、菲律宾等地纪事报及行业名录》上所刊广告，1875年。作者收藏。



瓦塞尔在港停留时间可能很短暂，留下的线索也只有这一条。本书所引广告很多由黎健强先生提供，他对香港早期照相馆的研究笔记让作者受惠甚多，在此深表感谢。据查，1869年11月16日，曾有一位名叫“约翰·戈登·塔尔伯特·瓦塞尔（John Gordon Talbot Wassell）”的24岁的年轻人入住香港的共济会分会（Perseverance Lodge），但至于他是否与摄影师瓦塞尔有亲缘关系，我们不得而知。还望后来学者对此再进行考证。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香港影相公司的掌柜究竟是谁无从确认。但三年中，在瓦塞尔之前，埃弗里特是该公司照相师傅的身份却是清晰无误了。

1827年11月25日，埃弗里特出生于伦敦的伊斯林顿区，其父约翰是马车夫（参见1822年10月至1841年3月圣路加地区老街洗礼人名录，第76页/LUK、017）。1849年，他在区邮政所任书记员，与苏珊·朱伟尔（Susan Jewell）成婚。结婚时，埃弗里特所用教名为约翰·亨利·埃弗里特，但此教名随后曾经更改，因此对我们追踪考证其生平造成了不小的困难。1857年5月11日，次子华尔特·威

廉·埃弗里特（Walter William Everitt, 1857—1911）出生，此时埃弗里特已经开始了他的照相生涯。华尔特后来也成为了一名摄影家，同时，还是很有名的艺术家。

1861年人口普查时，埃弗里特与妻儿一同居住在考文垂地区。1863年间，他在伦敦伊斯灵顿工作，合作伙伴名叫托马斯·查尔斯·特纳（Thomas Charles Turner）。1865年，二人一同迁至伦敦的奇普赛街（Cheapside），合作展出了“24张未经后期加工的名片小照原照，湿版法拍摄，铁溶剂冲印”，并在都柏林大博览会上得到了“荣誉提名”。当年12月，合作终止。随后，埃弗里特在奇普赛街开创了自己的照相馆，从1867年一直经营至1873年。（参见1866年《伦敦邸报》（*London Gazette*），及麦克·普利察 [Michael Pritchard] 所编《伦敦摄影师名录：1841—1908》，1994年出版，第59页，第112页；本书中关于特纳与埃弗里特的消息由普利察先生提供。作者再次谨表感激。）1871年人口普查时，埃弗里特与妻子和两个儿子共同居住在伦敦。最晚在1874年年年初，他已抵达香港。1874年4月13日，《伦敦与中国电讯报》对他的作品进行了报道，还发表了一些照片：



图1.29 香港影相公司，“香港近期遭台风袭击”，照片—木版画，原载1874年11月21日《伦敦新闻画报》。作者收藏。



图1.30 香港影相公司，“太平洋邮轮公司麾下阿拉斯加号抛锚靠岸”，根据照片所作木版画，原载1874年11月21日《伦敦新闻画报》。作者收藏。



图1.31 香港影相公司，执手杖的西方男士与执折扇、烟袋的中国男士合影，约1874—1877年。蛋白印相名片小照。照片拍摄者有可能是亨利·埃弗里特。作者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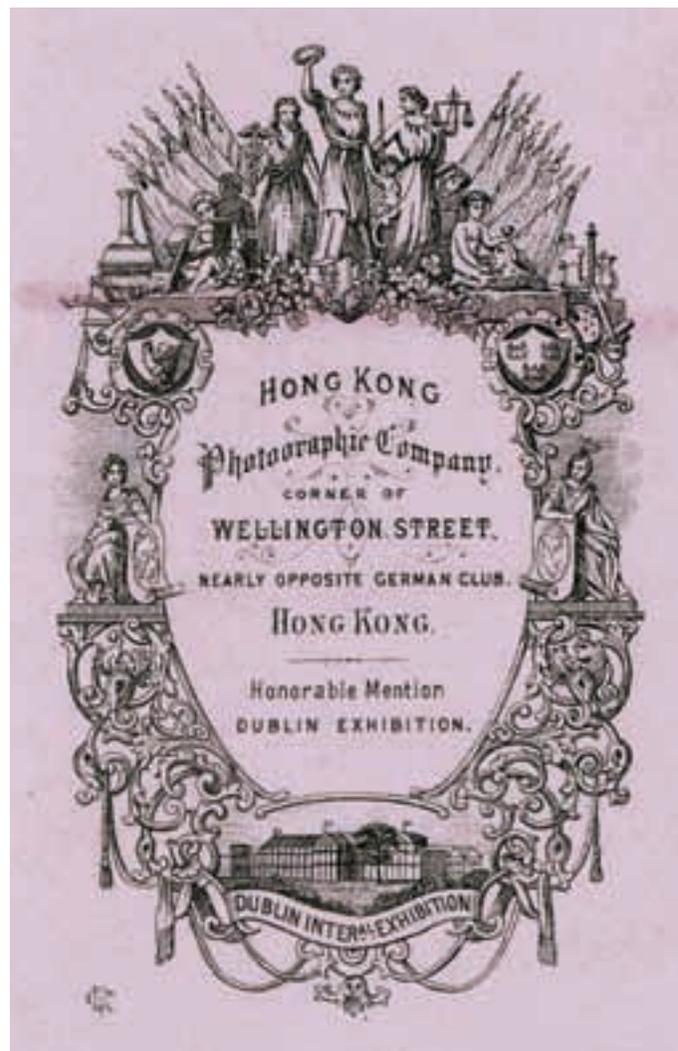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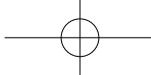


图1.32 香港影相公司，图1.31背面。照相馆徽标中印有1865年都柏林大博览会图样和文字。时任该照相馆摄影师的埃弗里特有作品参加了此次展览并获得“荣誉提名”，故特此注明以利销售。作者收藏。



香港影相公司的埃弗里特先生拍摄了市政厅博物馆 (City Hall Museum) 中让人叹为观止的“佛教地域变相图”。虽然原画的浓艳色彩不一定能在照片中体现出来,但照片对学习中国文化的学生来说,也不啻为一套成功的插图。照片在发行时,可能还配上了打印的文字说明标签。

1877年,埃弗里特离开香港。此后,我们对他的行踪无从知晓。直至1881年,他才在人口普查中再度出现,与妻子苏珊、儿子华尔特和儿媳一同居住在伦敦。1891年,苏珊再婚,埃弗里特想必在此前已离开人世。1911年11月3日,《英国摄影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hotography*)刊登了华尔特·埃弗里特去世的消息。讣告很简短:“华尔特·埃弗里特先生是亨利·埃弗里特之子。亨利先生是原芬彻奇街(Fenchurch)伦敦摄影学派(The London School of Photography)的成员,并曾在奇普赛街与特纳先生合开过一家照相公司,在伦敦专业照相业还在萌芽时期即已享有盛名。”(1911年11月17日,该报刊发更正,对埃弗里特工作过的照相馆进行了正名。)

亨利·舒仁与F.波普尔鲍姆(Henry Schüren and F. Poppelba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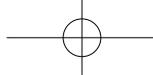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据1878年4月29日《德臣西报》载,亨利·舒仁在阿芳照相馆迁至皇后大道新址后,在后者旧址上开办了一家照相馆。1879年,舒仁的照相馆易手F.波普尔鲍姆。舒仁在抵港前,已在远东以照相谋生多年。他曾于19世纪70年代早期在印度雅加达为伍德伯里·佩奇照相馆效力(Woodbury & Page)。在1873至1876年间,在新加坡游历;1874年,造访了暹罗(泰国);1875年,造访了马尼拉;随后还到过曼谷。舒仁的早期行踪可参见约翰·福尔克纳(John Falconer)著《昔日掠影》(*A Vision of the Past*, 1987年出版,第25—26页,第191页)。舒仁在香港所拍照片均未有著录,作者仅见过一张由波普尔鲍姆照相馆拍摄的照片,背书云:“F.波

普尔鲍姆,照相师。原H.舒仁照相馆。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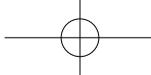
“底片库”(The Firm)

“底片库”一词由克拉克·沃斯维克首创。1978年,他在《清国旧影:1850—1912》(*Imperial Chinese Photographs: 1850—1912*)这本中国早期摄影史的奠基之作中第一次提出了这个概念,“并非用来专指某个商号或照相馆,而用来代称由众多抵港又离港的西方摄影师所拍摄的底片合集。”在1860年至1877年间,大约有11位西方摄影师来过香港,这些摄影师在抵港后纷纷筹办自己的照相馆。这些照相馆继承先人的器材和底片,随后又都难逃停业的结局。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底片被后来者保留下来,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底片库存,每一位后来者在拥有了这个庞大的底片库后,都会声称自己掌握了中国南部最大的图片市场,拥有最坚实的顾客群。随着这11位摄影师中的最后一位——亨利·埃弗里特的离开和香港影相公司的停业(1877年),沃斯维克认为,“底片库”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而这些底片究竟去了哪里,也成为了一宗谜案。(在该书第142页注释22中,沃斯维克提到,中国摄影师阿芳可能是这些底片的最终购买者和拥有者。)

“底片库”的代代相传最早始于“韦德与霍华德”照相馆。该照相馆筹建于1860年,底片传给了曾在此担任助理的摄影师米尔顿·米勒。1864年,米勒变卖了照相馆的全部家当,把底片传给了S.W.哈尔西。哈尔西把它们传给了西尔维拉。西尔维拉又在1867年把它们卖给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晒印了大量前人的作品,如1868年《德臣西报》所载,在当期所发表的照片中,“有两幅为弗洛伊德从前人手中购买底片、再晒印之作”(参见本书附录4)。据此看来,弗洛伊德有可能在1867年继承了“底片库”,还兼并了西尔维拉的照相馆。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1867年西尔维拉照相馆停业时,底片被公开拍卖,散落几处,弗洛伊德只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作者经手过大量这时期出版的相册,据观察,弗洛伊德所晒印的照片只



是底片全集的一部分而已)。1874年, 弗洛伊德离开香港。他究竟曾拥有多少底片, 又带走了多少, 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确定的是, 此时“底片库”已被打散, 并且, 在11位摄影师之外, 市场上还存在别的摄影师, 还流传着由这些摄影师所拍摄的底片晒印出来的照片(比如约翰·汤姆逊的作品。汤姆逊是弗洛伊德主要的竞争对手, 他在1868年抵港, 1872年离开, 所拍摄的底片有一部分散落在了香港)。因此, “底片库”的这一概念仅适用于讨论1867年前香港照相业的情况。此后, 照相业发展越发繁荣, 一家独大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代代相传的“底片库”也已散佚, 流入到更多的照相馆中。



第五章 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

引 论

圆明园，昔日的皇家夏宫，是一组建造极其精密的宫宇、花园建筑，位于北京西北约12公里处，占地314公顷。圆明园本是清朝皇帝的行宫，但学者汪荣祖评价说，“它更像是帝国运行的中枢。”“它不仅是清朝最壮观的建筑作品，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中国园林艺术的顶峰。”（参见汪荣祖《追寻失落的圆明园》，2001年出版。汪荣祖还曾提到，“圆明园”虽然名义上是一座园林，但在1860年之前，清朝五位皇帝都曾在此常住。因此，远胜于“园”。）1747年，乾隆帝授命宫中的耶稣会士在圆明园内筹建一组欧式风格的宫廷建筑群，辅以喷泉和花园。这组欧式宫殿（“西洋楼”）占地26公顷，仅占园内很小一隅，西式装潢，藏有各式西方工艺品，并不为皇帝生活起居而设，而作娱乐消遣之用。

1860年10月初，第二次鸦片战争末期，英法联军对圆明园进行抢掠；英国人不满清朝政府处死几名被押的西方人，因此实施报复，于10月18日到19日间，放火烧毁了圆明园。费利斯·比托曾拍摄过火烧之前圆明园中的颐和园景区，但并没有拍摄过“西洋楼”区域。这究竟是出于他个人兴趣所在，还是对火光中进行的抢掠行径的避讳，我们已无从知晓。对这场侵略和比托的拍摄活动，请参见《中国摄影史：1842—1860》（图127到129由比托拍摄）。

圆明园的主体建筑为中式木制结构，在这场浩劫中，基本完全焚毁；“西洋楼”景区的欧式宫殿由于多用砖石建造，因此尽管同样破坏严重，却能够劫后余生。大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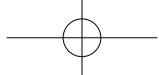
过后，当时在京的英国教会医生雒魏林在“北京与京郊笔记”（Notes on Peking and its Neighbourhood）一文中这样写道（原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第36卷，1866年出版，第147—148页）：

圆明园四周有人看守，不能进入，我骑马在园外转过两三次……所有建筑都被烧着了，但即使是从遗迹也可以看出它们曾经有多么辉煌精美。园内有雄伟的大殿……最后还有一组由欧洲传教士设计的意大利式宫殿，占地不小，石柱廊得以幸存，里面还能见到成排的花瓶和各种装饰工艺品。宫殿附近的花园里有几座凉亭和其余几座欧式建筑，一眼望去，俨然一座欧洲宫宇矗立在东方园林中。

这组建筑只占圆明园建筑群的一小部分。它丛林掩映，围墙环绕，当年定是美丽之极。园内有杂役清理残骸、捡拾幸存的瓷器砖瓦等等，不过没有开展任何重建工作。

1873年初始，园内开始部分翻修，但进展非常缓慢。荒芜的宫宇见证了中国遭受西方侵略者蹂躏的历史。1980年，中国政府宣布圆明园为国家重要文物保护单位，并启动保护措施；1984年，开始对园内目前仅存的西洋楼景区进行维修。但由于高额的维修经费，直至今日，西洋楼仍只有残垣断壁，已难现往日的辉煌。

更多信息请参阅毕梅雪编《圆明园》（1987）、狄瑞景《蛮夷的镜头：西方摄影师眼中的乾隆欧式宫殿》



(*Barbarian Lens: Western Photographers of the Qianlong Emperor's European Palaces*, 1998。以下简称《蛮夷的镜头》),及汪荣祖《追寻失落的圆明园》(2001)。喜仁龙在1922年拍摄过圆明园遗址,照片收录在《北京皇家宫殿》(*Imperial Palaces of Peking*, 1926)一书中(图206-216),该书同时收入了1786年西洋楼景区的几幅版画,再现了圆明园在1860年未被毁坏之前的景象。

拍摄了西洋楼的摄影师

中外学者对研究西洋楼的历史一直饶有兴味,对西洋楼残迹的早期照片也很关注。希望如下文字和插图对未来的研究者能够有所帮助。

1860年,西洋楼在被毁坏之前,并未有照片存世。最早的一批西洋楼残迹的照片摄于1873年,摄影师是恩斯特·奥尔末(参见北京世纪坛与秦风老照相馆出版的《残园惊梦:奥尔末与圆明园历史影像》,2010年)。在奥尔末之前,不排除也有其他摄影爱好者或商业摄影师到过北京,拍摄过西洋楼区域,只不过可能性很小而已。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尽管圆明园在焚毁后疏于管理,但一直是明令禁止入内的。在京各国公使馆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这一点,奥尔末在进园时也未得到许可。(我们暂且认为他并未拿走园内的物品。当然,这也仅是我们的猜想。参见汪荣祖《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第115页。)英国公使馆内的医生大卫·芮尼曾经提到,1861年3月,一位英国军官就试图进园,被清廷阻止,并照会英国公使,严禁离职的英国军官往来进出北京的活动。与其他一些西方人士不同,芮尼认为对圆明园的劫掠是一项错误的军事决定,且在政治上并未取得益处,他还特别写道:“圆明园刚被劫掠不久。在这个时候进园参观,恐怕任何动机都值得人怀疑。”(参见《北京与北京人》[*Peking and the Pekingese*], 1865年出版,卷一,第33—34页,第189—190页。)谈到游园意图,实际上,在京的西方人士所感兴趣的大多是传统的中式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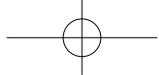


Occupation de palais de Trésor-été par les troupes françaises. — D'après les croquis de M. B. L., officier de l'expédition, et de M. Marchal.

图5.1 木版画,1860年10月,法军占领圆明园,据法国军官所绘素描而制。选自法国《画报》(*L' Illustration*),1860年12月22日。作者收藏。

筑,而对模仿西式建筑的西洋楼景区兴趣不大,如狄瑞景指出,大多数西方访客在此时更想去的是万寿山,去参观纯正的中国园林,而不是已经严重焚毁、除西洋楼外几乎没有任何残存建筑的圆明园(《蛮夷的镜头》,第35页)。1860年时,万寿山损坏程度较轻,且在19世纪末期得到重建,成为西方人眼中的“新的皇帝夏宫”。实际上,西方人士所谓的“夏宫”是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并不仅限于圆明园区域,还常泛指其附近所有的皇家园林和宫宇建筑。(参见尼克·皮尔斯 [Nick Pearce],《北京照片》[*Photographs of Peking*], 2005年出版,第110—120页,第151—153页。)

英国驻京领事馆随员米福特曾经提到“夏宫实际由三园组成,圆明园只是其中之一”,也被经常用来指代其余几处园林。西方人士常去的“万寿山”的中文含义是“万寿无疆的山”,本是禁止进入游览的,但护园士兵给养很差,衣衫褴褛,大门也只用一把小银钥匙就可以打开(参见米福特《回忆录》[*Memories*], 1915年出版,卷一,第351页)。米



福特在1865年8月的一封信中也曾提到过此前一次去万寿山游览的经历，并表示，“夏宫被毁，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过他在信中并没有写曾游览过圆明园，也并未提到过西洋楼景区。（参见米福特著《驻京岁月》[*The Attaché in Peking*]，1900年出版，第111—116页。）

一些摄影师曾来京拍摄过照片，很多人还提到拍摄过“圆明园”。比如上海的商业摄影师理查德·香浓，曾在1862年年末拍照，在1863年1月发布了照片广告，但他是否到过西洋楼景区不详。德贞医生曾与好友约翰·汤姆逊在1871年游览过圆明园，很有可能拍摄过照片。威廉·桑德斯和哈里逊·丁摩尔曾于1866年携手同游京城，当年8月，桑德斯返回上海，并发布广告，销售“圆明园”照片。1872年，D.K.格里菲斯在托马斯·查尔德的帮助下也到此间拍摄过照片（参见附录10）。俄国索斯诺夫斯基使团中的摄影师伯杨斯基在1874年造访此处。但是，迄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些摄影师曾拍摄过西洋楼景区。其中，查尔德是个例外，他在奥尔末走后，也曾拍摄过西洋楼。

综上所述，西洋楼迄今最早的照片摄于1873年。在1861年到1879年间，可确定的拍摄过西洋楼的摄影师有三位，他们是恩斯特·奥尔末、托马斯·查尔德和帛黎（A.Théophile Piry, 1851—1918）。帛黎是位摄影爱好者，他的照片大约拍摄于1876年到1877年间。帛黎出生于法国西部的港口城市南斯（Nantes），在华居住45年。他在1870年抵达中国，先在法国驻福州军械处工作；1874年，进入大清海关总税务司任职，在京工作，随后还曾调到其他几个沿海口岸及朝鲜海关。1901年，开始筹办大清海关邮政局，成为创立中国现代海关的鼻祖（参见狄瑞景《蛮夷的镜头》，第93—101页）。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布洛涅的阿尔伯特·卡恩博物馆（Albert Kahn Museum）藏有帛黎在1900年之后拍摄的照片底片，但其早期作品流传甚少，还有待研究。帛黎的父亲和儿子都曾在大清海关工作，在华相关文献资料也较多。（参见费正清等人编著《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书简》）同在大清海关工作、并任要职的H.B.莫



图5.2 滕园，《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书影，上海，1933年出版。托马斯·汉收藏。

尔斯（H.B. Morse）曾在其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1910年出版，卷一，第602页对页）中收录了一张由帛黎拍摄的西洋楼残迹照片。（摩尔斯在正文前第3页的图片索引中，错把此图注为由托马斯·查尔德拍摄，并把第612页对页上刊载的由查尔德拍摄的一张圆明园欧式门廊的照片注为帛黎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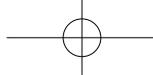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图5.3 恩斯特·奥尔末，偕奇趣背面，圆明园，1873年。选自滕固《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1933年出版。滕固从奥尔末处借来湿版火棉胶底片，印成此画册。托马斯·汉收藏。



图5.4 恩斯特·奥尔末，偕奇趣的音乐亭，1873年。选自滕固《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1933年出版。托马斯·汉收藏。



图5.5 恩斯特·奥尔末，偕奇趣南面，1873年。选自滕固《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1933年出版。托马斯·汉收藏。



图5.6 恩斯特·奥尔末，偕奇趣东侧，1873年。选自滕固《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1933年出版。托马斯·汉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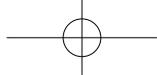


图5.7 托马斯·查尔德，观水法旁的西洋门，圆明园，1876年。选自滕固《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1933年出版。此图在查尔特的作品目录中编号206（参见附录3）。约翰·福尔克纳《西方视野：英国藏中国历史照片》中也收录了此照片，且底片上有签名，并标注了日期为1876年。（卷一，第192页，图5.20）托马斯·汉收藏。



图5.8 恩斯特·奥尔末，远瀛观，圆明园，1873年。选自滕固《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1933年出版。托马斯·汉收藏。



图5.9 恩斯特·奥尔末，偕奇趣全景，圆明园，1873年。选自滕固《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1933年出版。托马斯·汉收藏。



图5.10 恩斯特·奥尔末，观水法的石屏风，圆明园，1873年。选自滕固《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1933年出版。托马斯·汉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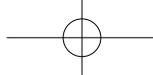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图5.11 恩斯特·奥尔末，大水法及远瀛观，圆明园，1873年。选自滕固《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1933年出版。托马斯·汉收藏。



图5.12 恩斯特·奥尔末，方外观，圆明园，1873年。选自滕固《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1933年出版。托马斯·汉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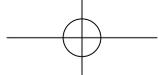


图5.13 恩斯特·奥尔末，偕奇趣北、迷宫之大门，圆明园，1873年。选自滕固《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1933年出版。托马斯·汉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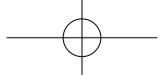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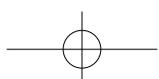


图5.14 恩斯特·奥尔末，海晏堂西侧，圆明园，1873年。选自滕固《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1933年出版。托马斯·汉收藏。



图5.15 恩斯特·奥尔末，海晏堂东北角，圆明园，1873年。选自滕固《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1933年出版。托马斯·汉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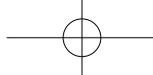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图5.16 托马斯·查尔德，“夏宫‘偕奇趣’，北京”，音乐亭南侧，约1877年。底片上有签名。作者收藏。



图5.17 托马斯·查尔德，“第201号，主要宫殿‘偕奇趣’南侧，圆明园”，约1877年。底片上有签名。作者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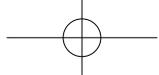


图5.18 托马斯·查尔德，“第203号，东翼，圆明园”，偕奇趣东翼音乐亭。底片上有签名，注有日期1877年。作者收藏。



图5.19 托马斯·查尔德，“第204号，喷泉大门，圆明园”，养雀笼东面，约1877年。底片上有签名和日期。作者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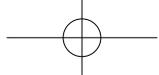


图5.20 (传) 帛黎, 养雀笼东面, 透过拱门可见蓄水楼, 约1876年。作者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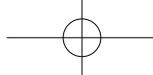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图5.21 托马斯·查尔德，“第208号，浮雕大理石柱，圆明园”，远瀛观，约1877年。底片上有签名。对照奥尔末于1873年所拍照片（图5.8）与（传）帛黎于1876年所拍照片（图5.30），可发现远瀛观在1873年到1877年之间又进一步遭到了破坏。作者收藏。



图5.23 帛黎，偕奇趣全景，圆明园，约1876年。作者收藏。



图5.22 （传）帛黎，从湖面望偕奇趣东翼，圆明园，约1876年。作者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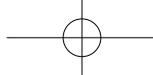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图5.24 (传) 帛黎, 从湖面望偕奇趣西翼, 圆明园, 约1876年。作者收藏。



图5.25 (传) 帛黎, 偕奇趣东面音乐亭, 圆明园, 约1876年。这张照片拍摄时间似乎要晚于托马斯·查尔德所拍照片(图5.18)。如果确实如此, 那么查尔德的作品拍摄时间要早于1877年, 或者还有可能, 这张照片并非帛黎在1876年所摄, 而是他在稍晚时候的作品。(关于此张照片拍摄日期, 以及帛黎在1911—1913年间所摄照片, 请参见狄瑞景《蛮夷的镜头》, 第97—99页。) 作者收藏。



图5.26 (传) 帛黎, 偕奇趣东翼音乐亭, 圆明园, 约1876年。威尔森摄影中心。



图5.27 (传) 帛黎, 偕奇趣北侧, 圆明园, 约1876年。威尔森摄影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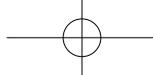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图5.28 (传) 帛黎, 线法桥西洋门, 圆明园, 约1876年。威尔森摄影中心。



图5.29 (传) 帛黎, 西洋楼内建筑, 圆明园, 约1876年。作者收藏。



图5.30 (传) 帛黎, 远瀛观的浮雕大理石柱, 约1876年。参见图5.21, 托马斯·查尔德所拍的同一地点的照片。作者收藏。



图5.31 (传) 帛黎, 大水法的石屏风, 约1876年。作者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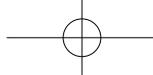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图5.32 (传) 帛黎, 西洋楼残迹, 约1876年。照片背后文字说明为“大理石楼梯构件”。作者收藏。



图5.33 (传) 帛黎, 圆明园, 疑为海晏堂一角, 约1876年。作者收藏。



图5.34 (传) 帛黎, 方外观, 圆明园, 约1876年。作者收藏。



图5.35 (传) 帛黎, 海晏堂, 圆明园, 约1876年。威尔森摄影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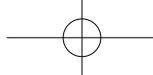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图5.36 (传) 帛黎, 方外观, 圆明园, 约1876年。威尔森摄影中心。



图5.37 佚名, 方外观。圆明园, 约1877—1879年。作者收藏。



图5.38 佚名, 偕奇趣, 圆明园, 约1877—1879年。作者收藏。



图5.39 佚名, 偕奇趣, 圆明园, 约1877—1879年。作者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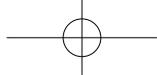


图5.40 佚名，线法桥西洋门，圆明园，约1877—1879年。作者收藏。



图5.41 佚名，养雀笼东面，圆明园，约1877—1879年。作者收藏。



图5.42 佚名，海晏堂，圆明园，约1877—1879年。作者收藏。



图5.43 佚名，海晏堂，圆明园，约1877—1879年。作者收藏。



图5.44 佚名，海晏堂，圆明园，约1877—1879年。作者收藏。



图5.45 佚名，西洋楼，北侧，圆明园，约1877—1879年。可与托马斯·查尔德较早的一张照片进行对比，参见狄瑞景《蛮夷的镜头》，第78页，图44。作者收藏。



图5.46 佚名，大水法南侧，圆明园，约1877—1879年。作者收藏。



图5.47 佚名，大水法南侧，圆明园，约1877—1879年，与图5.46同批拍摄。作者收藏。



第六章 摄影期刊

《中国杂志》(*The China Magazine*)

C.兰登·戴维斯(C. Langdon Davies)所编的《中国杂志》收录了由约翰·汤姆逊、亨利·坎米奇(Henry Kamidge)、弥尔顿·米勒及其他多位摄影师所拍摄的照片。约翰·雷迪·布莱克(John Reddie Black)此后创办的著名的《远东》杂志,从1870年发行到1878年,受到《中国杂志》的直接影响。《中国杂志》所含照片有些也散见于别处。除照片外,杂志还刊登各种趣味文章,内容多是关于19世纪中叶香港及中国其他地区的社会生活。

《中国杂志》创刊号在1868年3月发行。初为周刊,后为月刊,第4卷即最后一卷1870年出版。杂志中裱有原版照片,在远东各杂志中堪称首创。(1861年3月,由爱德华·埃哲顿[Edward Edgerton]编撰的《新加坡评论及月刊》[*Singapore Review and Monthly Magazine*]曾宣布要在杂志中“收录一些照片”,但是否果真照办,已无从知晓;参见泰瑞·贝内特《摄影在日本》,第34—35页。)《中国杂志》保存本极其珍贵。即使是在当年,亦价格不菲。1872年7月,杂志(卷一,第1号,第62页)在“打折书”一栏中曾刊发广告,四卷本“不含照片”、且缺页的旧刊也能卖到1美金一套。赫尔穆特·葛先姆(Helmut Gernsheim)在《英国摄影文学旧刊》(*Incunabula of British Photographic Literature*, 1984, 第79页)中只提到过此刊在1868年发行的圣诞节号。伯明翰公共图书馆和苏格兰国家图书馆所藏也是这一期;剑桥图书馆除藏有1868

年圣诞节号外,还藏有1868年仲夏号(皇家联邦协会藏品);碧波地博物馆藏有第4期和第16期(1868年4月18日及10月出版);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藏有第2期和第3期;耶鲁大学图书馆藏有第1期和第2期。作者几乎收藏了全套杂志(缺1870年的2期;第1卷缺8期)。唯一全套的杂志现藏于康奈尔大学的卡尔·A.柯罗克图书馆。

1868年3月7日,《德臣西报》首次对《中国杂志》创刊号进行了推介:

本刊今收到《中国杂志》创刊号。杂志系周刊,由C.兰登·戴维斯先生主编。侨界本弹丸之地,于新刊物之生存,困难重重。我辈怀良好之愿望,盼此刊不负众望,激励本地文学之发展,以飨读者。欣然阅毕,创刊号所用插图非木版及石版画等常见形式,而附照片三张,很有新意。三张照片中,两张图案精美,自是毋庸置疑,唯跑马地那张,景物微小,颇让人失望。刊内所发文章,较我等之期望稍欠分量。盖既为杂志作文,虽不期望“题材厚重”,但较之坊间报端常见之零星片语,本应更加隽永考究才是。

两天后,《士蔑西报》追加评论说:

《中国杂志》创刊号已于周六出版。虽刚创刊,但前景向好,必然无疑。创刊伊始,乃以照片为重,谓可归属摄影刊物之类。馈赠亲友,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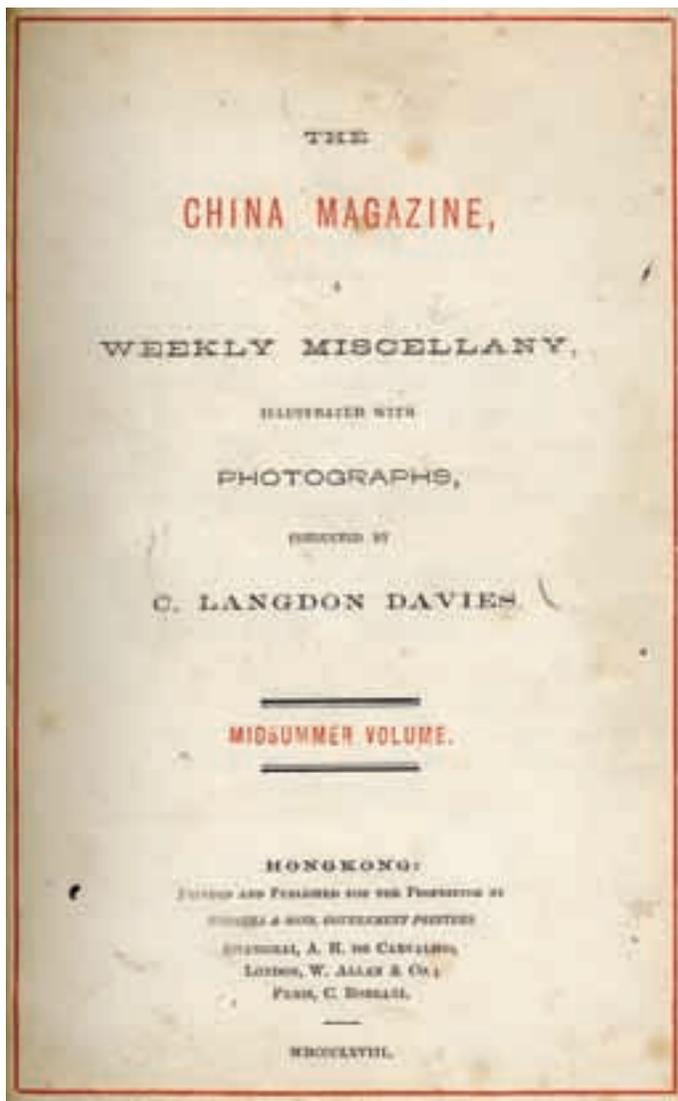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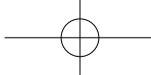


图6.1 《中国杂志》发刊号封面，1868年。作者收藏。

港风貌必能了然于胸。阅之，果不负众望。刊内附照片三张；两张系殖民地风貌，寄返家中，可为永久纪念。刊首照片摄于维多利亚山下桥头，公共花园、总督府、教堂、军营等清晰可辨，维多利亚城精粹，悉收眼底。其二者，乃跑马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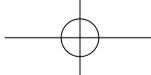
赛马第三日、于半山东面所摄，遥望城内、港口、盘山公路，历历在目。刊末列有以下诸期照片索引，内容引人入胜。香港、广州、澳门景物自不能省略，一桥庆喜（Stotsbashi）及恭亲王肖像亦在名单中。刊内文章笔调轻松，无丝毫晦涩难懂之处……《杂志》定能实现其办刊初衷，我等拭目以待。

1868年3月14日，《北华捷报和市场报道》评论说：

新刊发行

香港文学界又有新举动。据香港《孖刺西报》近日援引消息，新刊《中国杂志》正酝酿发行。创办新刊乃魄力之举，内容想必新颖有趣。今传此刊“重内饰”，将用精美照片补充，较之以往各刊，优势明显。在华木版画家乏善可陈，“上海泼克”^{1*}虽内容讨巧，但绘画水准差强人意。香港发刊之漫画刊物，构思幽默，但质量亦欠佳。横滨有艺术家沃格曼先生（Mr. Wirgman），技艺精湛，但如将其所编“泼克”系列漫画与在“新闻画报”上发表之插图相比，优劣立现。我等以为，英文刊物之插画普遍精美，读者已习以为常；在华办刊，为求佳誉，援引照片乃唯一选择。如用版画，且将就采用编辑朋友之作，而不邀娴熟艺术家润笔，已恐难满足读者。英国本土之“周刊”、“月刊”，多以邮件寄送订阅者，插画质量甚高；本地刊物若质量低廉，自然难以让读者满意。现《中国杂志》宣称，将用照片替代版画插图——若真能如此，则不啻为革新之举，吸引读者。又及，此刊系文学刊物。至于新增此类刊物是否必要，我等尚持保留意见。凡有新刊发行，成功者，皆有增益前人之处。今各种期刊已丰富多样，商贾、军人、海

^{1*} “上海泼克”（Shanghai Punch）中，“泼克”为当时英国一本风行世界的幽默期刊《Punch》的音译。



员、牧师、医生、共济会员、建筑师、文职人员皆各有专刊伺候。各式市井小报、政治文章、历史与科学刊物，已布满书桌。就鄙等所见，《中国杂志》之读者群似乎并不明朗；举凡杂志之成功，不在编者之热忱，而在读者之完备。在华西方人士，能力卓越者，不在少数。商人、传教士与领事馆中，皆有善为文者，对中国之事，博学广识。然凡此能力卓越之人士、苦心孤诣所著之文章，终究能否愿赐此刊发表，鄙等不免存疑。在华刊物，数目已不少，且编者众多，如布莱克伍德 (Blackwood)、弗雷泽 (Fraser)、康希尔 (The Cornhill) 等。一流文章，多在本地刊物发表；若此刊只求得二流文章，则不如不读。我等虽在华居住，但对中国之国家、人民、习惯了解不多；纵然我辈不求对中国之事了然于胸，亦不求如驻华领事等人深谙此间风俗，但既已在华居住，不论贡献多寡，皆有知识互享、维护此杂志读者圈之责任在肩。《中国杂志》编辑之热忱我等悉可想见。但与其发行新刊，不如巩固旧刊，似乎更加可行。

3月18日，《北华捷报》在收到《中国杂志》创刊号后，又配发了一则评论，观点仍以质疑为主：

初，我等听闻《中国杂志》将在香港出版，不免有些担心，恐其读者数尚不足支撑刊物运行。创刊号果然印证我等所虑。

1868年3月23日，《德臣西报》对《中国杂志》第3期作出好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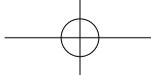
我等欣然乐见，第3期杂志进步甚多。照片画幅更大，比前期更精美，文章亦有改善。我等期盼杂志日后更上层楼。若照片能维持此期质量，则此希望似乎不难实现。

但几日后，《德臣西报》又发表了另一则评论：

《中国杂志》第3期出版，我等所最关注者，无外其内容。上海一刊物对创刊号曾给予友好评价，更引发我等对此刊及《中日释疑》(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等东亚诸文学刊物现状之关心。《中国杂志》凭借兰登·戴维斯先生之努力，青出于蓝、略胜一筹。我刊向来寡有褒扬之语，但对《中国杂志》，确有偏心。依我等理解，戴维斯先生办刊初衷，并非想以照片作为辅助工具，而乃刊物之核心：第3期（同其他诸期）成功之道理，也正在于此。《字林西报》云，大概无人愿以每季度7.5美金之高价，去购买一本在周六读上一小时之轻松文艺刊物。各种英国文学期刊大约要价都比此便宜。但若以此价购买一批精美照片作为收藏，成套订阅中国各色人像、风景照，则自然另当别论。订户可对照片内容提出建议，归国时，携全套中国照片回国，以作永恒纪念。因此，我等格外期望，杂志可将照片按类发行，如首期以香港、广州为主，第二期以日本一两个北方港口为主，等等。如此这般，读者为积攒照片必按期购买，杂志在商业上定会大获成功。文章沦为次要角色，也在所难免。但只要保证照片全部在东方拍摄即可。

在日本横滨，1868年5月2日，《日本陆路邮报》也发表了评论。没有特别褒扬之语，提出了几处意见，但对杂志持鼓励态度，并相信它会克服不足、逐渐进步：

我等怀良好祝愿，盼《中国杂志》能很快脱离周刊形式，按其编辑初衷，成为一本“能放在桌上之耐读刊物，而非随手丢弃之报章。”我等将在日本全力相助。《中国杂志》订阅年费30美金，而远东同类周刊，年费通常只要24美



金，且篇幅更多。既已收此高额订费，该刊编辑压力必然甚大。若内容质量不能名副其实，则难以为继。纵有一流作者，也需以发行量为保障。《杂志》装帧颇为简陋，不过裁纸、裱糊封面而已……若能发展为月刊或季刊，则似乎更为妥帖，经费也会更有保障。如果以现在之面目不变，则不出六个月，恐难免停刊。

该刊特色在于采用照片，但我等对此抱有遗憾。照片质量不高，拍摄粗糙，有划痕和斑点，制作工艺甚至不及娴熟摄影爱好者之水准。照片拍摄内容广泛，主要集中在香港及周边区域，还算吸引人；但拍摄角度总差强人意，镜头不好，焦点不实，技术不佳。初，该刊曾向订读者许诺，照片采用韦德与比托先生之作，但今日照片，显然不是出自二位名家之手。

如上，对此杂志已作颇多介绍。溢美之词，暂且按下不发。《中国杂志》办刊初衷值得鼓励。相信藉由编辑之努力，定能日日精进，从周刊变为月刊，文章篇幅加长加重，杂志更加名副其实。若果能如此，则编辑兰登·戴维斯先生功不可没。杂志总体印刷良好，易读，罗郎也父子印字馆出版，印刷质量果不负期望。

1868年8月28日，《北华捷报》发表文章，评价杂志质量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评论

几月前，我刊曾收到《中国杂志》创刊号，当时所发评论，并非美誉。杂志系周刊，共16页，内附有中国风景等与内文相关之照片若干。文章有趣，易读；照片本系此刊特色所在，但尺寸稍小，不免徒增遗憾。我等评价，此杂志乃消遣刊物，“一个小时即可浏览完毕，读后随手放置而已，而每年订费30美金，未免不值。”订费如此之高，若非每期刊发一两篇有关中国主题之有益长文，则很难为继。即便如此，生存亦恐

非易事。如今五个月过去，该刊编辑已有系列举措：改每期16页周刊为每期32页月刊；每季度订费由7.5美金降为3美金。该刊之高额订费曾把很多读者拒之门外。就内容长短来说，新定价虽与旧价格并未有明显区别，但总价回落，无疑有利于发行。杂志同时进行了改版。我们欣然期待，文章质量也会有进一步提高。

改版后的第1期杂志名为“仲夏卷”，含有照片31张，很多系首次发表，其中17张为约翰·汤姆逊的作品，出版日期为1868年6月。当年年底，圣诞节时，第2卷出版，刊物转为月刊，内含24张照片，其中有3张为汤姆逊所摄（其他作者未署名）。有趣的是，在编辑后记中，除了报告杂志进度并发布征订信息外，还提到负责杂志印刷出版的“罗郎也父子印字馆”的“H.L.罗郎也先生对此刊钟爱有加”（杂志第189页；罗郎也父子印字馆还曾于1870年出版了汤姆逊的《北珠江风景》相册）。第3卷，即“1869年仲夏卷”含有30张照片，其中有几幅为亨利·坎米奇的作品，其余虽未署名，但可以肯定为弥尔顿·米勒和费利·比托的作品。1870年，第4卷出版。当年5月6日，《海峡时报陆路刊》（*Strait Times Overland Journal*）提及收到《中国杂志》1870年1月和2月刊。这很可能是《中国杂志》所出版的最后两期。1870年2月22日，《北华捷报与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这样评价：

《中国杂志》最后两期收入几张上海照片——包括泖塔（Min Pagoda）、共济会堂以及洋泾浜。书中还译有中国故事，较之前几期，有诸多进步。

一年后，1871年2月15日，《北华捷报与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还曾询问过《中国杂志》近况：“近日未曾获闻《中国杂志》动向。此刊是否还在出版？”

《中国杂志》的确切停刊原因不详。该刊首卷发行时，各报刊同行皆不看好。此后几期，又连遇挫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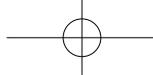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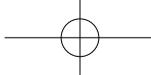


图6.2 弥尔顿·米勒，“香港贫民区人像一组”，约1861—1862年。选自《中国杂志》，1868年，卷二。照片曾被归为约翰·汤姆逊名下，但实为米勒作品。米勒在E. & H. T.安瑟尼公司所出版的立体照片系列第21号与此画面几乎相同。原立体照片标题为“在香港沿街补衣的中国贫苦女人”（参见《中国摄影史：1842—1860》，第193页，图158）。《中国杂志》当年想必是从米勒处购得此张底片或照片，以作发行。作者收藏。

第2期末尾，编辑戴维斯就曾提到为按时出版所克服的重重困难：有时纸张短缺，有时照片印制跟不上截稿时间，“照片底片还曾出现过几次失误”。但即便如此，他对未来发展还是很乐观，提到“现在库存纸张足够杂志一年的印量，印刷机也足够印刷两期杂志，晒印的化学药品足够印制半个中国的照片。”不过纵然如此，刊物最终还是难以为继。

《中国杂志》的编辑和所有人是查尔斯·兰登·戴维斯。戴维斯1842年前后出生于英国布里斯托，1865年，在香港铸币厂工作，任金块办公室（Bullion Offices）主管（参见香港公共事务部，卡尔·史密斯档案）。据香港《孖刺西报》报道，他与萨拉·安妮·希尔（Sarah Anne

Hill）成婚，1867年8月27日，得双胞胎一对。1867年12月14日，从铸币厂离开，继续其社会活动。他还做过公共会计师、海损理赔师和一般商业代理工作。1870年8月27日，戴维斯曾在《德臣西报》上发布声明，称《中国杂志》出版发行办公室将于当年9月1日易手他人。不过，他并没有找到买家。1871年1月16日，《德臣西报》宣布拍卖《中国杂志》办公室的全部股份、印刷机、打字机，以及在《中日释疑》（*Notes and Queries*）和《远东日记》刊物的股份。当年，戴维斯回到英国。从人口记录看，他和妻子及2个儿子居住在黑斯廷，职业是在华商人。1891年人口普查时，他住在伦敦的肯辛顿，职业是个体电力工程师。除妻子外，家中还有三子四女，



及5名仆人。1901年，他仍在此间居住，职业为电力工程师。戴维斯还是英国皇家学院的成员，1896年成功申请到了一项海底电缆方面的专利。

《中国杂志》于1868年创刊，曾受约翰·汤姆逊支持，但双方合作时间很短，第2期杂志中，汤姆逊作品数目已经不多。因此，其余照片，除了坎米奇、比托和弥尔顿的作品外，很可能由杂志编辑和工作人员拍摄。戴维斯自己甚至也可能参与了拍摄。此处，我们还想指出，1869年的《中国、日本、菲律宾等地纪事报及行业名录》中，曾提到《中国杂志》有一位照片制作员，名为M.巴普蒂斯塔（M. Baptista）。本书前面曾介绍过。总而言之，《中国杂志》是新闻摄影领域的先驱，直接启发、影响了《远东》杂志的出版。尽管杂志在印刷质量上谈不上成功，但它收录了汤姆逊、坎米奇等摄影师的作品，很多照片都是独家发表。

《远东》杂志

《远东》杂志由约翰·雷迪·布莱克创刊并编撰。布莱克爱好摄影，技术不错，也是位记者。他看到《中国杂志》中的照片贴页，受到启发，决定用这种形式创办自己的杂志。《远东》从1870年5月发行至1878年12月，其间发表了由20多位摄影师在中国和日本拍摄的750余张原版照片。杂志系双周刊，内容兼顾报纸之时效性，同时辅以精美照片。1873年7月始，改为月刊，文章篇幅加长，侧重介绍日本历史及艺术。

杂志创刊时，布莱克人在横滨。他在1870年5月30日的卷首语中说，办刊初衷是“在世界与古老帝国之间建立起美好的手足情谊”，内容围绕历史、文化、社会习俗方面，以日本为主，兼顾中国及其他远东国家。不过，布莱克虽有此计划，但直到1875年10月之前，杂志并未刊发任何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在1871年5月16日的杂志中，布莱克曾解释办刊遇到的各种困难，说中国本土摄影师不能让人信赖（他对日本摄影师同样非常挑剔）。他抱怨说，每期杂志都要裱糊上百张照片，因此对同一张照片，往往需要多幅底片，但是中国摄影师对

此很不理解。他还表示：“我们雇不起在华的欧洲艺术家们。他们时间太宝贵了。”布莱克曾想过派自己麾下的摄影师迈克尔·莫斯“前往中国沿海诸口岸，拍下大量照片”，但结果是此计划未能成行（关于莫斯，参见本书第257页）。对于杂志经常不能按期出版一事，布莱克通常的解释是：天气炎热潮湿，不利于照片印制；且药品经常断货，质量不能保证；优质纸张短缺。这些也是《远东》杂志照片质量不稳定的原因。而且，同一张照片，确实存在相近的版本，这也确实说明，布莱克在印制照片中常同时使用多幅底片。同时，他也不拒绝使用翻拍照片和复制底片。

截至1873年7月1日，《远东》杂志订户已有相当增长。布莱克提到，很多读者会认真地把杂志做成合订本，而且还会购买副本；创刊号全部售罄，“要额外添价很多才能买到”。他宣布，杂志从双周刊改为月刊。他还表示，以往期刊中，照片拍摄者很多都是无偿提供照片，但今后杂志除表示感谢外，还会有“稿费”。

1875年10月，《远东》杂志第1系终止。第2系直至次年7月才出版。复刊时，布莱克已侨居上海，在英文《华洋通闻》报工作。在《远东》第2系卷首语中，布莱克再次提到第1系中“照片质量不均”的问题。他还表示，在新系列中，将保证中国和日本照片数量各占一半（实际上中国照片占了绝大部分）。同时，他还期望，在所有东亚的英文报刊中，《远东》发行量名列第一。订阅费需提前预付，一季度4美金，半年7美金，订阅全年，则为13美金。布莱克原计划将复刊后的第1期印制300本，没想到再度售罄，还出了第2版。

杂志订户继续稳步增长，在高峰期，曾达到500到1000人次。在1877年5月号中，布莱克声明，为在中国和日本之外继续扩大市场，将杂志订阅价格降为每年10美金。同时，“对一直以来为本刊提供协助的上海著名摄影师桑德斯先生、菲斯勒先生表示感谢。”他还提到，“已派一名中国艺术家，配全副装备，前往西北省份拍照。我等日夜期待收到他的作品。”不过，布莱克对实际情况太过乐观。在1877年9月号中，他这样写道：



The "Far East."

IN A FEW DAYS will be published, the JUNE number of this Illustrated Magazine, the last of the second volume; and the final number of the first twelve-month's subscription of the New Series. Although the Proprietor is quite aware of its many short-comings, he can confidently point to the improvement in the present over the former series; and to the later numbers over the earlier ones in this. This improvement shall continue. He is able to acknowledge, with, he believes, justifiable pride, the very great favour with which the *Far East* has been received wherever it has penetrated; and that includes almost all the civilised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is ambition is, however, to do far better than he has hitherto succeeded in accomplishing; and to make his little periodical a real Journal of fine Art, high-class Literature, and reliable Information, connected with the countries of which it professes to treat. What has been done must speak for itself. What he hopes to do, may be gathered from the fact, that not only has he received, and still continues to benefit by, the sympathetic assistance of Mr Saunders and Mr Fidler, the widely-known Photographers of Shanghai, but he has received offers of a large supply of negatives of characteristic pictures from Baron Stillfried in Japan, whose artistic productions admittedly surpass any that have ever been taken of the natives and the scenery of that country, and are justly celebrated over Europe and America.

Further, negatives have been promised by eminent Photographers in other parts; and though they "are lang o' comin," doubtless they will come. And, added to this, a special Chinese artist has been well-equipped and sent out to the north-west provinces, by the proprietor; and his pictures, taken specially for this Journal, are daily expected.

As regards the literary work, hitherto dependence has had to be placed on a few very kind and willing helpers, whose papers have imparted a high tone to the magazine. But now that it is so well known and appreciated throughout these regions, and so favourably received elsewhere, it is but reasonable to expect that the number of contributors able and willing to enrich its pages with valuable information, or to adorn them with well-written essays, tales and translations, will increase.

So much for the contents of the *Far East*.

With regard to its circulation, the proprietor thankfully acknowledges the very liberal support he has received—far exceeding the most sanguine expectations he dared to form when he commenced the new seri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twelve-months, however, convinces him that it may be increased indefinitely, and find a large constituency in other countries besides China and Japan.

In the hope of realizing this expectation, he has determined boldly to reduce the price to the very lowest at which it can be produced supposing the circulation to rest at its present number. But he believes that this step will so greatly extend the circulation, as, in a few months, to remunerate him better at the reduced than at the former prices. As this, however, is a problem yet to be worked out, he appeals to all who approve of the enterprise and believe in its usefulness, to aid in rendering it successful.

He may be permitted to express his own opinion that such an Illustrated Journal, if properly conducted, artistically and literarily, reflects credit on the community from whose midst it emanates. He has previously promised "to make perfection his aim." He is sure that if improvement has marked its course in the past he will be credited with a desire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in the future; and this he confidently relies on being enabled to attain, by the continued generous support of all residents in the Far-Eas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bove, the undersigned begs to announce that

The Terms of Subscriptions will in future be:—

Quarterly—Payable in advance—	£	3.50,
Half yearly— do do	£	6.00,
Yearly— do do	£	10.00.

N.B.—Of the past year—i.e. from July 1876 to June 1877, there are very few entire copies left. These will continue at £ 13 until June 15th next; after which, if any sets remain, the price will be £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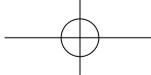
Annual Subscribers may have the addresses to their friends abroad, printed, and their papers posted direct, on the day of publication, postage free, on payment of One dollar extra.

Subscribers wishing to discontinue at the close of the present volume, will oblige by sending notice to that effect to the office: where the names of new subscribers will be gladly received.

Far East Agency,
23, Keangse Road.

J.D. CLARK.

图6.3 《远东》“新系列”出版第一年的编辑思考，1877年5月。作者收藏。



THE FAR EAST;
MONTHLY JOURNAL
 OF
CHINA AND JAPAN,
 Photographically Illustrated.

THE First Edition of 300 Copies of the July Number (No. 1 of the New Series) being now quite exhausted, a Second Edition is in preparation, and will be ready for delivery about the 26th instant.

The August Number (No. 2 of the New Series) now ready, and contain is an excellent portrait of

Sir Thomas E. Wade, K.C.B.,

H. B. M.'s 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to China, for which His Excellency sat specially to Mr. FISLER, at the request of the proprietor of the *Far East*.

September Number (No. 3 of the New Series) will contain a portrait of

Li Hung-chang,

for which he sat last year at Tientsin to Mr. FISLER.

Persons wishing to subscribe to the *Far East* will oblige by sending their names to the Office of this Paper, or the undersigned, as early as possible, that it may be known approximately how many copies to print; as the preparation of each subsequent Edition not only adds vastly the trouble, but also to the expense of the production.

Single Numbers cannot be sold.

Subscription:—\$4 a Quarter, \$7 Six Months, \$13 a Year—
 Payable in Advance.

J. R. BLACK,
 Proprietor and Editor.

1m.

图6.4 《远东》杂志上的广告，1876年9月。此时杂志的订户大约是300人。作者收藏。

经过七个月的等待，我刊先前所派往长江上游拍照的中国艺术家已经归来，带回照片若干；但对作品质量，我们颇为失望……这些照片只能告诉我们，这些地方本来能孕育多少照片佳作……中国艺术家实在不会选景，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他们通常只能胜任照相馆的工作。不

过，总算还有个别照片可用，本期和随后诸期将陆续采用一些。

布莱克刊发了这位中国摄影师在重庆拍摄的照片。这位中国摄影师很可能来自公泰照相馆。1878年10月号中，曾发表过以“公泰”署名的照片。

1878年12月，《远东》杂志停刊。《远东》在19世纪70年代涵盖了大量中国与日本的信息，其所发表的照片中（虽大多未署名），有一些附有署名，对我们甄别照片作者有很大帮助。《远东》第2系的主要摄影师包括威廉·桑德斯、洛伦佐·菲斯勒、托马斯·查尔德和朱利安·爱德华。唯一提到姓名的中国摄影师是上海的“公泰”。由于布莱克本人也爱好摄影，他在多篇文章中都谈到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环境下拍摄的难度，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相关参考。他对刊内所用图片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总能一针见血。《远东》杂志在世界各地均有收藏，但就作者所知，都没有完整地收录第1系和第2系杂志。

本书附录11摘自《远东》杂志，收录了和中国摄影相关的一些信息。更多信息请见泰瑞·贝内特《摄影在日本》，第146—149页，以及《日本老照片》，第90—96页。日本的雄松堂对两系杂志都进行了再版，第1系全七卷（1965—1966年出版），第2系全五卷（2007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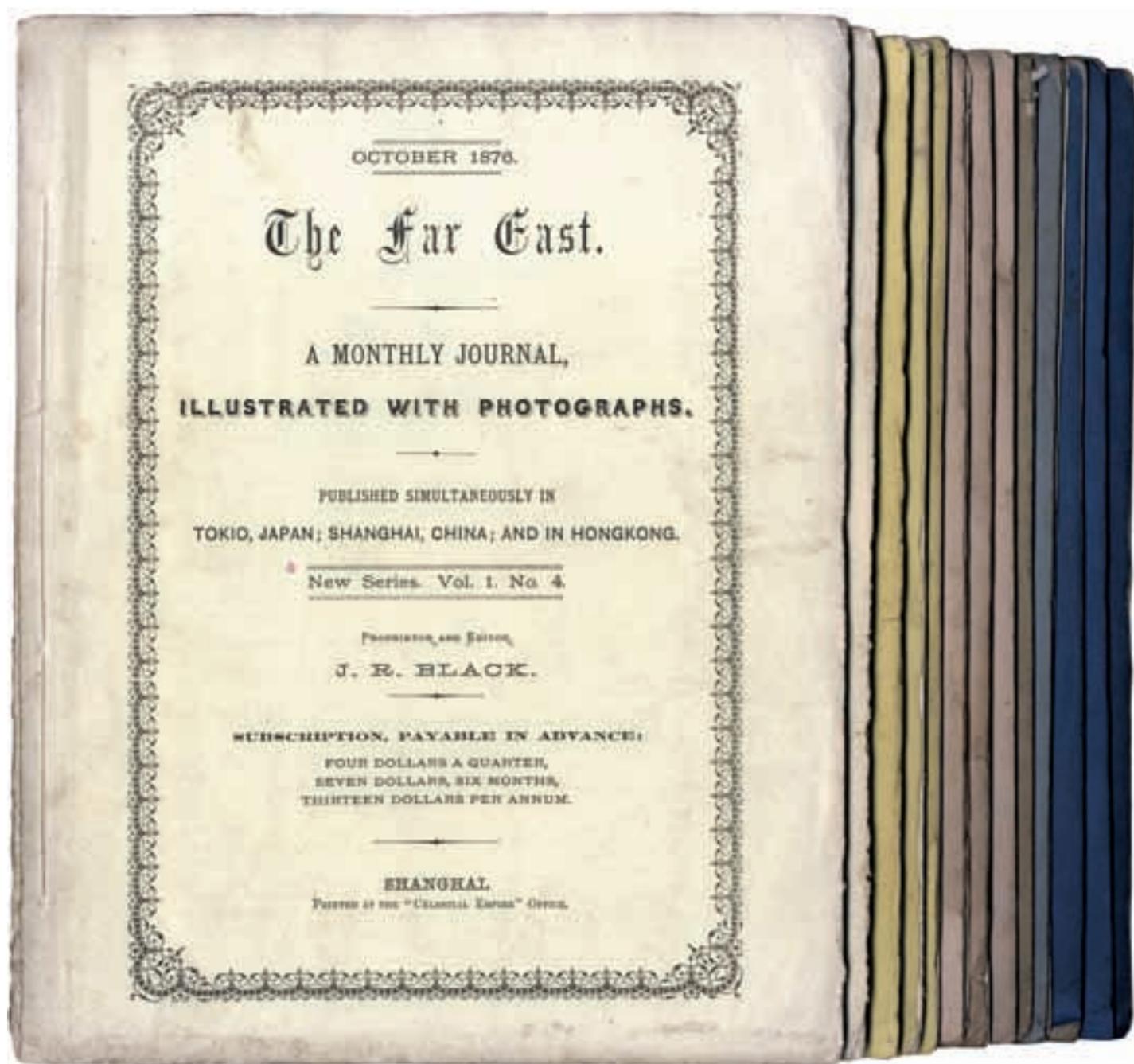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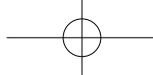


图6.5 《远东》杂志的一期，“新系列”，1876—1878年，伯纳德·夸里奇公司。



结 语

在本书中，我试图对人们已掌握的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西方在华摄影师的情况作一个归纳、总结，同时增补一些新材料，以促进我们对这一课题的了解。不过，在今后的10年、20年间，这段历史恐怕还会经历很大的修订和补充。我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是出于几点考虑：

尽管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段时期内大多数在华商业摄影师的姓名，但对业余摄影师的活动，还挖掘得不够。这部分摄影师并不会在地方报刊上发布广告，也不会出现在商业名录中。我们仅能从书和文章的版画插图中得知他们的名字。他们虽然很隐蔽，但总还在我们的视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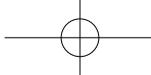
我越来越觉得，我们所了解的这一时期在华业余摄影师只是他们中的很小一部分。在此不妨举一例说明：2009年，《中国摄影史：1842—1860》（英文版）出版后，银版照片的收藏家和研究者马修·伊森伯格（Matthew Isenburg）找到我，告诉我他藏有一张1846年时，美国驻广州传教士裨治文订购全套银版摄影器材的单据（参见本书附录12）。订购这套设备后不久，裨治文就动身去了上海。关于裨治文，并没有任何记载提到他曾在何处拍过照片，但这种可能性并不能排除。这就意味着广州、上海两地通商口岸的年表有可能需要再度更新。

当然，我不认为相机在当时在华的西方传教士、领事馆人员、海关工作人员和商人中得到了普及，但我确信，他们中不乏会拍摄者。果真如此，那么今后对这部分人群还会有更多的发现。

19世纪距今并不是遥不可及——19世纪中叶的摄



图6.6 约翰·雷迪·布莱克，“年轻的中国女子，苏州。”选自《远东》杂志，1878年5月。伯纳德·夸里奇公司。



影师的孙辈、曾孙辈的后人仍然健在，先祖未发表的照片、日记和信札，可能仍安然保留在后辈手中。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也常常因为经费问题而未能对已捐赠的照片和手稿进行及时的整理。只要这些史料逐步得到整理，可以为研究者所用，那么中国摄影史中更多遗失的板块就会得到复位。

传教士档案中，有很多关于摄影活动的记载。但面对这些大部头的档案，即便是最有决心的摄影史学家，恐怕也会望而却步。如果能把大量的手稿进行誊写、数码化，将会大大有利于史料传播。但这项工作无疑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金。网络于此爱莫能助。

不过互联网在很多事情上的确功莫大焉。随着19世纪文章、书籍报刊的数字化，以及文字检索功能的实现，研究方法也经历了一场变革。现在，全世界的图书馆里，系统都可以对馆藏的文字文献实现共享，相信在未来10年、20年后，影像资料也同样可以实现共享。如果想系统地甄别不同摄影师的作品，那么这项技术革新就显得尤为重要。家谱资料的数字联网化也日益增长，对考证摄影师生平信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19世纪60和70年代，中国与英、法、俄、美等国有很多交往。然而对法文与俄文档案方面的研究仍属起步阶段，远不及英、美部分。相对来讲，研究者对法国人在华摄影活动所知甚少，对俄国摄影师更是如此。此外，我们也不该放弃中国本土的史料。人们一般认为，由于这段时期中国局势动荡，加上20世纪60年代“文革”中对“小资产阶级”照片、手稿资料的破坏，中国国内几乎不可能有史料保存下来。但历史从来不能简单

地一言以蔽之，相信总会有散落的资料公诸于世，改写我们对中国早期摄影史的既有认识。

我还希望读者认为此书尚有一点点价值：中国早期摄影史图景广阔，以往一向被认为难以理出头绪。本书粗略草成，恐只能作为过渡性的著作，以飨读者。本书是“史书”，更是“尚待完成之作”。这么说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但更多后续工作，还有待其他学者完善、发展。照片研究常让人心生沮丧，但所得与回报也同时激动人心。这就是我在此间工作的体会。



附录10

摄影在中国：格里菲斯所作三篇文章

D.K.格里菲斯常为伦敦各摄影期刊撰稿。此文刊发在1872年12月13日出版的《摄影新闻》上（第598—599页），描述了在中国进行摄影活动的种种挑战：

摄影在中国

阁下——一直以来，人们对如何改变中国人陈腐、狭隘的观念已多有议论。我认为，没有什么比摄影更能堪此重任。辩好发辫、精心打扮一番，出门，点烟斗，去照相馆，求得一副不朽容颜——我们看到周日早上前去拍照的中国人，就看到了希望。

能让中国人坐下拍照绝非易事，即便是付美金和钱币（再经一番讨价还价），也是如此。他们对相机太过恐惧，即便是最穷困的苦力和生活最潦倒的人，也不愿意在照片前景充当模特。哪怕付给他们的钱相当于一周劳动所得，他们也不为之动心。即便是在上海这样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大城市，当地人也对照相这种“黑艺术”反感强烈。他们视之为“洋法术”，认为其太过神秘，断然不是什么好事。

不久前，我离开上海，前往乡间，期望乡下人对照相不至于如此排斥，好让我拍下“天朝”子民的生活小影。那时我觉得相机是这愉快的乡间旅行的陪伴，前方有许许多多的寺庙和优美的景色等待我去拍摄。沿江有许多迷人的小村庄，农舍的影子投影在碧波里，我只愿钻入黑色的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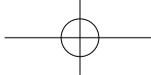
帐篷里，取张玻璃底片，拍下这沁人心脾的美景。

不过眼前所见的一切迅速打消了我的痴心妄想。沿路尽是些平淡无奇的稻田，禾苗刚从水田长出，四下里散布着无数坟堆，画面纵然不至于太过无趣，但毫无美感可言。

好在我们这队人谈笑风生，船舱又很宽敞，我很快就把失望抛到了脑后，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清晨，我还在睡觉，只听得队友突然喊道：“兄弟们快看，是‘萨利·维金斯’号（Sally Wiggins）！”船已进入原华亭县（Wahding）内一小湖，两岸尽是些太平军与戈登部队作战后留下的残迹。我们很快登上了维金斯号，船上设施舒适，我们在那里吃了早餐。

我备好所有器材，登岸，准备对这地方不懂科学的居民们进行一通狂拍；我举着相机在农舍间、竹林里四下飞舞——当地人视摄影为灾难，我能拍下的，也只有静止不动的景物、湖边风光和几处破败的庙宇；在离开前，通过仔细协商，我终于说服了几名苦力充当前景，拍下了一两张有人的风景。

尽管农村的人惧怕相机，但对外国人还是友好的，有时相处甚至很快乐。他们会尾随你几英里，告诉你哪里能拍到漂亮的雉鸡；当你把拍好的雉鸡照片拿给他们看，他们欢呼雀跃，高兴得为你叫好，愿意一路上为你扛设备，不求分文。



他们地处乡村，少受城市影响，人们真诚、友好，总愿帮你一把，且几乎不要回报。当然，这种情况只限于靠农业为生的乡村，其余地区则与此不同。

谈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商贾阶层——占大多数——在每天和外国人的贸易往来中对外国人较友好，但官员和士大夫阶级由于惧怕外国势力的影响，对我们很反感，且煽动民众对外国人产生猜忌；他们利用贫苦人群的轻信和无知，散布假信息，声称外国人残暴成性，且经常鼓动民间的排外行为。同时，由于外国人自己对中国人不够尊重，常把他们当劣等民族看，也无疑助长了双方的敌意。我对此深感惋惜。

中国人是讲究务实的民族，在做生意上很有领悟力，每日经营皆有所获，渴求富贵、衣锦还乡。迁居他乡、辛勤劳作在他们而言是常事，因此也颇能理解外国人千里迢迢赴华初衷。

不少外国人在华种种冒险经历多为传教，但最近一次集会，也有人当众提出，我们与其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不如先把本国国民皆感化为耶稣信徒。在华传教士中不乏善良、愿为主牺牲之人，有些忠守道德品行之士（尽管人数不多），不时挺身而出，澄清些流言谬语。

您的 O.K. 格里菲斯

[作者注：姓名在原文中拼写有误]

上海虹口

1872年8月17日

下面一篇文章分两部分发表于1875年10月22日与29日的《摄影新闻》上（第512—513页，第524—525页），是格里菲斯所作信息量最大的文章之一，描述了他在1872年去北京游览的经历。

漂泊者北京一游

D.K. 格里菲斯，上海

从上海至北京途中，我曾在芝罘稍作停留。

芝罘在山东省境内，是个靠海的好地方，也是中国名胜地。北行一路旅途劳顿，需要休整，我便在此停留了一周，随后由水路往天津去。

气候潮湿，我心中焦急，盼望着能早到白河口，拍下大沽炮台。但炮台实在其貌不扬，周围环有低矮的围墙，即便是天气好，也难拍成好照片。我们在炮台对岸抛锚，等待涨潮时潮水没过浅滩的木篱，才可靠岸。这样等待了几个小时后，水面没过了稻田旁的泥地，我们的船一直开到了双弯头。随后，我登上了海关官员准备的小船，在傍晚摆渡到了附近的城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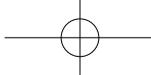
天津城内建筑多是泥筑的，看起来很寒酸，唯一能看的是洋人建的房屋。我去时，大水刚没过附近的村庄，景色看上去更是荒凉。我在仅有的一家外国旅舍住下：那是个泥棚屋，仅有一层，幸好主人好客，倒胜过泥瓦房。

当年中国与英法联军的合约在海光寺内签订。除却该寺和天津教案事发地点，别处倒也无可拍。我从英国领事馆取回护照，便雇了一艘中式带棚船，前往北京。同行的有一名会说英语、可当翻译的北京小厮、我从上海带来的一名仆人，还有厨师和轿夫。

船很大，有六名健壮、赤裸的船夫。我们顺着潮汐前行，沿河过桥，快速向北京驶去。

船行至通州，一行人需换乘骡马前行。翻译阿喜（Ahee）推着独轮车，装着我的行李、摄影用品和仪器。料理好一切，我住进了一家中国客栈，一路上被人称作“洋鬼子”，还有很多人好奇地跟着我到了房间。近距离相处，他们身上气味不好，好在很安静，我便准许他们检查我的行李以及各种外国物品。一位女士还冒险尝了尝我的苦啤酒，并错把它当作以前从另外一些游客那里喝过的白兰地。我纠正了她，她便向我请安表示歉意，举止恭谨，让人心生尊敬。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沿石板路出发。路上车槽很深，如果乘坐马车，会太过颠簸，容易损伤



照相器材，不如独轮车平稳。我将行李家当交由上海的小厮与苦力慢慢推车前行，自己与阿喜策马扬鞭，穿过几片棉花田，两个小时后，远远看到了北京的城墙。城墙宏伟，我猜想城里必定富饶，且如迷宫一般，内藏金银珠宝。骑马从护城河桥上走过，穿过城门，一路烟尘滚滚，炙热难耐，我就这样进入了北京城。街两岸有很多人围观，其中一些还与翻译阿喜起了争执。路面宽阔，没有遮蔽，太阳径直暴晒，尘土飞扬。好不容易进了客栈，我终于如释重负。四天内终于享用了一顿可口的晚餐，寝室大床也颇为舒适。

我拜访了威妥玛公使，他热情听取了我的一行计划，并在英国护照之外，还向我提供了一本由中国当局颁发的通行证。实际上，北京的各国公使都很乐于提供帮助和建议。中国人很迷信，排外思想又日渐浓重，对外国人敌意很深，各国公使馆都希望外国人在华旅居期间人身安全能尽量有所保证。大城市的居民仇视外国人，北京更是如此。

在这座远东古都，四下环望，尽是古迹；只有人群的叫嚷声、车水马龙的喧嚣属于当下。马车没有减震弹簧，从身旁驶过，嘎吱作响。马路很宽，常走马车，中间已凸起。晴天时烟尘漫天，雨天时一脚烂泥，车轴也常陷入泥中，轧出深深的辙。路边常有竹蓬占道，或卖些旧衣服，或为食肆，老板沿街叫嚷，招呼腹中空空的车人光临。

我在中国的首都停留了一个半月。以往的艺术家常大费笔墨描绘北京的穹顶、尖塔，画面前景总有河流，水流平缓，还停泊着一艘艘小船，树影掩映……然而眼前的一切却让我大为失望。好吧！摄影师总是要面对苛刻的现实的，不能平添幻想，让本来无趣的画面生动起来。我想到护城河和死水塘的气味，怎么也不能把它们与昔日艺术家笔下的美景联系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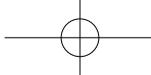
北京是我眼前的北京，不是幻想中的北京。

几座古寺距据城中心很远，不易拜访，对外国人来讲是唯一有吸引力的东西；古寺建筑风格独特，常会把欧洲旅行者从眼前所见的北京带入昔日的遐想中，这是最欢愉的时刻。

北京城内最吸引人的是内城里的“紫禁城”。我站在城墙上拍了很多眺望皇城的照片。在拍摄之外，遇到很多困难。我必须克服人们的迷信和对我的时时骚扰。苦力们也常常由于害怕而不敢挑我的相机和器材，路上耽搁几小时是常事。有时他们还会假装不认路，我的仆人和小厮也常常充当同谋。为对付他们，常常要武力恐吓。

我发现北京人在相机前表现得没有性格柔顺的南方人那么害羞。不过，不管我躲在多么安静的角落，身边都会围上几千名衣衫不整、汗流浹背的中国人看热闹，透过窗户探头探脑，几乎把光线都挡住了。无论我怎么劝，都是浪费时间，且我也不愿多生是非，所以干脆视若无睹，冲他们友好微笑，拍拍他们像婴孩一样圆的脑袋——简而言之，向人群示好；但可惜这一招不管用。时间对他们来说一点都不重要——很多人点起烟，似乎把一天时间都搭在这里，看这个外国人到底要做什么。

人群在好奇心得到满足后，变得平静下来，开始在我背后扔小石子取乐，一面还笑着喊：“洋鬼子！”我身边围着都是人，突然耳边一个大石子呼啸而过，打碎了窗户玻璃。我不得不采取点行动了。这一招很缓和，但对驱散中国人群很有效：我让小厮给我取来一个玻璃杯和一瓶苏打水。取水的一举一动，人群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悠然地揭开瓶口的包装，木塞“嘣”的一声弹起，人群也立刻吓退了。我的这个小把戏一向有效，留下的中国人也被逗得哈哈大笑。在被中国人围观时，我这个方法既不失尊严，又能保证自身安全。我所做的不过是日常举动，他们出于惧怕而躲闪不及，颇为滑稽。这个小插曲过后，我坐下点起一支烟，再也没有人捣乱了，苦力们也



开始为我收拾行李。

第二天，我前往天坛。天气实在炎热，我遣苦力先行，自己随后骑马赶上。当我策马抵达天坛门口，苦力们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天坛大门闭着，还有一群中国人站在那里等着看“洋鬼子”。我交给看门人2美金，本以为麻烦就此结束，只可惜——“上帝让万物皆有其福，也必受其缚。”

所以，在中国，纵有万般事物可供享乐，也总有规矩要守。我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进了一道门，里面还有一道，看门人站在那里晃悠，一见到我，立刻兴奋起来，觉得有“洋钱”可赚，即刻关了门，希望能再从我这里得一笔银子。他们坚持2美金是最低价，即使是伦敦的商人也没有他们这般坚持“一口价”。阿喜坚决反对我付钱，我缄默了片刻，还是决定如数奉上。我又花了2美金，终于抵达了最后一层围墙内，里面就是圆顶的祈年殿了。当时大约午后2点，我有足够的时间去拍摄，并赶在日落城门关闭前出城。拍了这些照片后，此行最艰巨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我准备去看看京郊的景物。我从顺治门启程，先拍摄了八里庄宝塔，最后抵达碧云寺，还在那里宿营过夜。房舍建在中式风格的园子里，园中有一池塘，四周叠有假山，其间还有小径穿梭。

趁着小厮准备午饭，我点上一支雪茄，在小径和竹林里散步。这地方很浪漫雅致，设计者想必自有画意在胸。假山崎岖，在碧蓝色的天空下更显嶙峋；竹林和小庙点缀其间，以使景色不至单一。我正享受着这份宁静，小厮突然喊道：“午饭好啦！”

我住的房舍里外都很体面，客厅很大，地上铺了深色的抛光木地板；前后都有窗，墙纸是浅色的，床置于台上，铺有红色床单；椅子旁有小桌，桌上摆着诱人的饭菜；这里的每件东西都干净得让人惊喜（不同寻常），我坐下来，怀着愉悦的心情享用了一顿美餐，心满意足地准备开始工作。拍摄不难，一切顺利，僧人们都很友好，

也没有旁人围观。

我在这个僻静的地方住了三天，然后返回卧佛寺，拍摄“卧佛”的照片，前往圆明园遗址，住在夏宫旁边小村庄里的一家中国客栈里，第二天一早返回北京城里，顺路拍摄了大钟寺。皇帝大婚典礼在即，辛普森先生在《伦敦新闻画报》上已经画插图进行了介绍，我很荣幸为他撰写序言，在此，就不再赘述了。这一路上中国人对我普遍有敌意，大概也与皇帝即将大婚有关。北方人觉得摄影这个黑魔法被“蛮夷”垄断，用以加害“天朝子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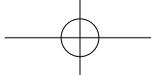
北京的德贞医生刚用中文发表了一部摄影专著，准确介绍了摄影术的全部内容；恭亲王还为之撰写序言。相信此书销量定会不俗，也会减轻民间迷信。但这几百万民众对摄影术的怀疑、不信任对摄影师来说会是很大的障碍。在这里旅行目前仍很危险，不过情况也在好转，中国人对西洋科学和艺术的接受程度在日益增加。

1875年5月28日，《摄影新闻》（第259—261页）撰文描述了一家中国照相馆的情况。此文及脚注皆由格里菲斯撰写：

天朝照相馆

D.K.格里菲斯，上海

虽然文章标题如此，但请君勿作联想，把本文所述与任何天堂般的事物联系起来，或误以为本文会为读者描述一个神话国度。在这篇小文中，我将向您介绍一家由中国人经营的“远东”照相馆。随着台阶上楼是客厅，摆放着几把破旧的藤椅作为装饰，一张宁波圆桌，一个玻璃橱柜，里面陈列着各种老式的肖像镜框和廉价的相框；壁炉上挂着一面镜子，镜子照出的人像显得古怪老气；墙上挂满了各种面无表情的中国人肖像，和神情呆滞的外国人肖像。我的描述太过苍白无力，不足以描述它们展现在游客眼前时的



震撼力，您不妨动用自己的想象力。屋里还刻意摆放着英文读物。我们找到了一本1840年的伦敦商业名录，是照相馆主人最近刚从拍卖会上买来的，出价为6两银子（约合2英镑）^[1]。用这个价格买这么一本大厚书，也算值了。

中国人买东西必买便宜货，至少要低于市场均价才行。对他们来说，省下几分钱比追求质量更重要，因此，在照相馆里，陈设、设备，处处都显得简陋寒酸。外国居民很少光顾，唯一的客源是外国船只上的水手，或是偶尔前来一试的外商的书记员。水手几乎垄断了这家照相馆的客源，以至于我们的“艺术家”常会操着蹩脚的英文问道：“您‘属于’哪艘船？”——“您‘属于’船长还是工程师？”——要么就问：“您是船上的大副吗？”

很多中国人开的照相馆生意都不错，他们天性刻苦、坚持不懈，总是学习、借鉴外国同行的新作，只不过有时这些仿效之作看起来有些怪诞。

中国摄影师从同胞那里得不到一点支持。因此，这些照相馆全部开在侨界，无一例外。有几位广东摄影师想把生意拓展到内地的大城镇，但由于内地人对摄影术十分厌恶，总会干扰拍照，甚至威胁摄影师生命安全，因此他们最终也不得不打消此计划。我自己就曾经有过行李架被捣毁在路上、雇佣的苦力被打、相机被砸坏这样的经历；中国人扔石子、砍我，但幸好由于他们多少对外国人有些惧怕，我才能逃生；如果拍摄的是中国人，那么后果会严重多了。中国人如此仇视摄影，是因为他们坚信照片摄人心魄，一旦被照片拍下来，那么人就失了魂魄，活不了多久。但传说被拍后并不会在一个月内立刻死亡，最长有人活了两年之久。不过有极少数中国人十分喜欢拍照，还和家庭成员一起来照相。他们拍照的准备工作一般很多，会让苦力拿来家里最好的衣服：接待这样的客人，摄影师也更精心，要多费些唇舌；顾客坐下来，把衣摆打开到最佳效果；

一手拿鼻烟壶，一手执扇。必须照正面照，要看到双耳，脸两侧必须对称；两腿在照片里要显得一样长。中国人不懂透视法。双手摆放时，要确保能看到十个手指。如果顾客留有长指甲，那么最好能够拍下来。鲜花自然不可少，通常插在桌上的小花瓶中；若能摆上法国钟表，顾客会更乐意。照片里每个细节都精心布置，一般有三四个好友帮忙。一切就绪，顾客喊道：“可以了！拍大些！”如果顾客和摄影师来自不同省份，说不同方言，则需要翻译在场；如果他们都会“洋泾浜英文”^[2]，那么就可以直接交流。我们之间也是用这种方法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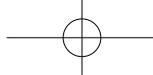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在顾客漫长的准备时间里，摄影师会一直安慰他，仔细估量这笔生意能获利多少，靠在新加坡躺椅上，抽着烟，摇着扇。等一切准备就绪，小厮会禀告这位“精通艺术的专家”，请他出场。“专家”休息了这么长时间，慢条斯理地问道：“什么事？”他不慌不忙地放下烟枪，慢慢起身，迈着猫步，去见顾客。双方鞠躬行礼问候，照规矩握手寒暄。随后便是短暂的客套，互相邀请对方先坐下，最后经过一番谦让，两人决定同时入座。上茶，两人都呷上数目相同的几口。互相介绍一番，摄影师开始切入正题：“您要照什么风格？要‘照得像’，还是‘照得好看’？”

这种蹩脚的“洋泾浜英文”要问的是，顾客到底是想不惜重金、拍一张极美的照片，还是要一张看起来更像他本人的照片。不妨假设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位顾客需要的是后者：摄影师起身，去准备玻璃底片。期间两人还有一番对话，所问在我们看来都是很私人的问题，但在他们看来却是很自然得体的，符合规矩。

照片拍完了，“艺术家”满意地宣布，这张照片称得上“第一”，且“非常像”。坐着的顾

[1] 中国银两在各地价值不等，在上海，平均1两银子兑换6先令。

[2] “Pidgen”，指工作、买卖活动等。[译者注：此处译为“洋泾浜”]



客说：“拿给我看看。”“艺术家”礼貌而肯定地谢绝了：“现在还不能让您过目。”顾客见他语气肯定，便只能问：“一打多少钱？”

艺术家：“5美金即可。”

顾客：“我觉得5美金太贵了。”

艺术家：“这么好的照片，太贵了？我要价和其他人一样。我不会多收您一分钱^[3]。要是我要价高了，我们会觉得丢脸。别人了解^[4]我的生意。我说的都是事实，5美金是正常价格。”

双方最终达成一致，顾客换了衣裳，临走还看了看各种镜框和照相器材，打点行李，上轿，满意地离开了。

^[3] 此处指小铜钱，该钱币圆形，中间有方孔，便于成串；1200钱大约能兑换1墨西哥元。

^[4] “Savey”，即为“了解”。



附录11

《远东》杂志摘录

约翰·雷迪·布莱克所编著的《远东》杂志前后有两个系列。第一系列从1870年5月发行至1870年10月，第二系列（亦称“新系列”）从1876年7月发行至1878年12月（参见本书第310页）。布莱克曾在“新系列”首卷（1876年7月刊，正文前第1—2页）撰文简述了杂志创刊历程及未来计划。现将全文照录如下。随后摘录的为杂志所涉及关于照相的内容，包括一般性的文字，以及摄影活动在中国普及的情况。

《远东》杂志 发刊语

《远东》杂志“新系列”发刊，办刊人在此对以往支持本刊之诸位人士，及未来有教于我之人深表谢意。

1870年5月，本刊开始酝酿在日本出版一本有远东照片做插图的画报。当月最后一日，第1期杂志面世。初为双周刊；尽管办刊艰辛，好在各处慷慨支援，总算坚持了下来。

办刊人殚精竭虑，从首卷始，每期皆亲笔撰写文章，为求杂志能有益于读者，付出了莫大心力。创刊以来，务求改进。尽管外界评论常不免苛责，但杂志确也精进不少；只是插图质量不均，颇为遗憾。但尽管有如此种种问题存在，订户却未有抱怨，仍继续支持、鼓励。英国、美国等各读者总给予高度评价，更让办刊人感喟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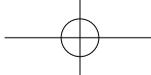
1873年6月，办刊人决定转变杂志风格，并将杂志改为月刊出版。自第4卷第1期起，以新面目问世，并为改版前言撰文。现将此文摘录如下：

即日起，《远东》杂志出版方式有变。杂志虽为双周刊，但办刊人及编辑从未将其视为短命新闻纸，而是希望其成为值得远方好友购买、合订、珍藏之刊物。事实也确实如此：新订户无不要求从创刊号开始购买本刊；第1卷已经售罄，在市场上需要加价方能购得。

因此，办刊人决定进一步改善杂志印刷风格及整体质量。改版后的杂志仍沿用旧名，成为月刊。除仍将继续关注日本本土发生的新闻事件、满足本土读者需求外，将着重于发展刊物自身特点。

直到目前，我刊编辑收到撰文者稿件支持，总无以回报。发行收入捉襟见肘，不足以支付酬金相谢。今后，我们希望这种状况能得到改善；向《远东》投稿者，不论撰写文字，或提供照片，都将得到实在报酬，而非仅仅口头感谢。本刊编辑在此期望能吸引更多对日本情况有了解之人将其真知灼见写下来——希望我刊能传播事实、历史及其他知识，在此地立足发展。

这篇发刊语发表后，《远东》一直出版至1875年10月；但后来，杂志曾一度延期出版，办刊人最终无计可



施，只得暂时停刊。

从1875年7月到1876年6月，杂志出版断档。少量几期在出版后没有算发行量，也并未标价。

在复刊后，杂志按年度正常出版，办刊人对未来充满欢喜，杂志前景充满希望。

此前，办刊人靠通讯员提供中国照片和文章，以供《远东》选择发表，保持本刊特色。通讯员与中国本地报刊多有联系，对本刊也有很多承诺，但往往不能兑现，且实际上几乎没有提供什么照片；在当时，办刊人也不能离开日本，亲自去中国拍摄照片。

最后，机会终于出现，办刊人来上海常驻，对中国题材的内容，所付出的精力，更胜于以往十倍。今后，本刊日本与中国内容比率将旗鼓相当。最新的一期杂志中，由于办刊人离开日本，为保证按时出版，便全部采用了中国照片，日本照片反而没有出现了。

本刊保证未来所用照片地域色彩稍稍减弱，而具有东亚普遍特点；将刊发日本和中国的风景及各色人像照，包括各种民族的照片。

尽管本刊以照片为特色，且订户多因看重照片而订阅本刊，但办刊人同时承诺，将同时尽力改善文字，为本地文学期刊添一份力。

杂志内容介绍与“样张”在上海广泛传播，发行后必定会受到欢迎；日本订户自不必说，香港和其他商埠中，自然也会有人订阅，不久之后，本刊即有望成为中日等国中英文刊物发行量之最大者；本刊也将极力促进我们亚洲几国和其人民之了解，以期超越目前同类杂志。

自这份小刊物面世，长久以来，一直仰赖读者垂爱。本刊不求完美——办刊人亦不敢对读者妄言许诺，但定以日日完善为办刊目标，不断精进，不荒度时光，力求早日达成此愿。

第一系列

卷一

1870年9月16日（第8号）

第8页：布莱克提到，他刚收到大阪、鹿儿岛和台湾照片若干，并期待能尽快收到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照片。

1871年5月16日（第2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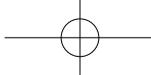
第1到2页：布莱克提到第1期杂志出版时所遇到的困难，并提到计划让摄影师迈克尔·莫斯（Michael Moser）去拍摄“中国沿海的通商口岸”（但未成行）：

我们很快发现，太阳光如果太强，同样不利于曝光。尽管万般小心，但总是掌握不好曝光量。天气也常常不利于拍摄；药品……有时断货，有时质量不好，偶尔还有损坏，导致不能使用。我们总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我们正等着一种高质量的相纸能赶快运来……收到了一大批不错的底片，拍摄地点包括江户、大阪、京都、神户、长崎，以及一些名气不太大的日本城市……我们的摄影师 [作者注：指迈克尔·莫斯] 也在拍摄一组“人像照片”……每期至少刊发一张……办刊人和中国本地艺术家的合作收效甚微……他们不理解每张照片不能只提供一张底片……在华的欧洲艺术家们时间太宝贵，雇不起，但……9月，计划派我们自己的摄影师 [作者注：仍指莫斯] 去中国沿海商埠拍摄一系列照片，有望带回一大批有价值的作品。

卷二

1871年11月1日（第11号）

第126页：一篇题为“日本艺术与艺术家”的文章指责日本本土摄影师中“一些人操纵机器很娴熟，但他们丝毫不懂得如何去‘摆’肖像，也不懂得风景照该如何取景。他们丝毫不会考虑照片中的前景和距离感，只



会生搬硬套……他们都不配称为‘艺术家’，仅仅是些匠人……”此时，布莱克对上野彦马和内田九一这样的优秀摄影师的作品还不太了解。1873年5月1日，他才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后者，说：“内田九一拍摄了不少非常好的照片，他是位才华出众的日本摄影师，拍摄了大量日本各地的照片，对外国人很有吸引力。”（参见泰瑞·贝内特《摄影在日本》，第148页）

卷四

1873年7月1日（第1号）

第2页：布莱克提到，他从未想过订户会如此钟爱杂志，会把几期装订成册收藏；“创刊号全部售罄，要额外添价很多才能买到。”改为月刊后，在形式上更像一本杂志了，且更有能力支付作者稿费。

卷六

1874年8月31日（第2号）

第46页：提到有两支美国金星凌日观测队抵达日本。一支队伍驻扎在海参崴，另一支去了北京。北京的这支队伍中，由兰格（W.V. Ranger）担任首席摄影师，此外还有两名摄影助理：埃尔海姆·沃森和本杰明·J.康拉德。

新系列

卷一

1876年7月（第1号）

正文前第1—2页：复刊序言已收录于本附录。订阅年费提前预付，一季度4美金，半年7美金，全年订阅费13美金。

第1—8页：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与日本文学研究”的文章，文中提到，以往和现在的其他一些刊物，如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杂志》周刊发行了三四

年，也用照片作为插图（第5页）。就此预言，《远东》也将达到数千发行量（第8页）。此文作者签名为“S”，身份不详。

第8页：布莱克回忆了自己在12年前，于1864年6月到访上海的经历。

第15页：“我刊意在多拍些铺面照片，以满足读者兴趣。只可惜拍摄得一般，且画面偏暗。我们相信会找到更好的照片，以飨本刊众多国内读者。”这说明布莱克在杂志复刊后，有可能亲力亲为拍摄照片。

1876年8月（第2号）

第38页：英国公使威妥玛允许我刊著名摄影师菲斯勒先生为他拍摄一张坐像，用于我刊发表。

第40页：“我们的读者或许会嘲笑经营店铺的生意人迷信不化。他们见镜头就躲，不敢拍照，怕自己魂魄被摄去，随后死亡。文明人自然不信这样的迷信，但这种说法在中国人和日本人中间却很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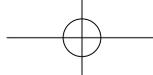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第48页：“6月30日，吴淞铁路上海段通车……这是中国第一条营运铁路，它满载乘客，于午后5点半驶离上海站……车上约载有150人，皆为受到邀请的绅士淑媛。火车行驶前，上海摄影师桑德斯和菲斯勒曾为大家拍照留念。”

1876年9月（第3号）

第75页：描述了菲斯勒为李鸿章拍摄肖像的场景（照片上有菲斯勒签名）：

李鸿章肖像定受欢迎。他权倾朝野，且熟悉外务，无人可比……读者面前的这张照片为L.P.菲斯勒先生去年在中国北方时拍摄，照片中李鸿章虽说身着便装，但尽显精明强干。多谢菲斯勒先生提供此照片。当时，李鸿章与威妥玛阁下正就英国与中国和谈一事会晤，为东亚最让人瞩目之事。

本期杂志封面上印有广告，销售照片“和其他艺术



作品”，称“即将提供大宗中国与日本的风景与人像照片供观赏”，落款为“《远东杂志》艺术代理”。以此看来，布莱克已用买来的各种底片晒印照片出售。这些照片中，《远东》上发表的可能只是其中一部分。

1876年10月（第4号）

第100页：“本期杂志中有3张照片都和中国殡葬有关。这些照片并非直接拍摄葬礼，而是拍的每年依惯例祭奠亡人的仪式。仪式在9月举行，各地都有此习俗。我们得以有机会前去观看，并拍摄了照片作为纪念。”

第100—101页：依据本期图片说明，以及1877年9月号第55页所述，可以确定布莱克和他的团队拍摄了民间每逢秋季祭祀鬼神的照片（第78、82和86页对页）。

第101页：论及日本天皇与皇后的照片，并提到这些照片是翻拍之作，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得到由原始底片晒印出来的照片。

1876年11月（第5号）

第107页：布莱克提到，在1874年，《远东》杂志的发行量“不到现在的四分之一”。

第125页：“本期所刊森有礼先生照片（第120页对页）为桑德斯先生所摄。桑德斯先生的新照相馆在目前堪称最舒适且设置最完备的照相馆。桑德斯先生已在上海生活多年，拍摄了大量中国和日本的照片，且以人像闻名；自他的助理斯托斯先生（Mr. Stoss）从欧洲抵沪后，其照相馆技艺更是日日精进，值得赞许。我刊将在以后多多发表由桑德斯先生拍摄的人像照，他慷慨相助，愿意为我刊义务拍摄照片，我刊日后所载照片的艺术价值自然不言而喻了。”

第128页：布莱克感谢桑德斯和菲斯勒“慷慨协助我刊，提供多张照片，把自己出游所拍作品与我刊分享”，并公开表示感谢。他说自己现在“期望其他在中国和日本活动的摄影师也能为杂志提供帮助”。在预告12月刊内容时，他透露，杂志将发表一张“‘纽卡斯尔号’（H.M.S. Newcastle）船舰与海员合影”，照片由桑德斯照片翻拍而来，原作尺寸要更大些。此

外，还要发表桑德斯及其助手斯托斯共同拍摄完成的费女士（Miss L. M. Fay）和威廉斯博士（Dr. S. Wells Williams）与教会中国劳力的合影。布莱克宣布，杂志将发行“新年特刊”，“尺寸比寻常大，至少包含10张照片。”他说：“从每张底片晒印几百张照片绝非易事，文字工作也如此。他希望这项工作能为他带来些许荣誉，且为读者喜闻乐见。”

1876年12月（第6号）

第152页：刊登“纽卡斯尔”号船舰（第150页对页）照片。“四艘船舰泊于吴淞口，桑德斯应邀前往，登上其中的‘纽卡斯尔’号进行拍摄……海员全部身着整齐的蓝色制服。这样的大合影，由于人在镜头前难免活动，因此常常拍虚，但这张照片却很清晰，很罕见。原作尺寸更大，大约有15英尺×12英尺。桑德斯先生特意翻拍、印制成较小的尺寸交予《远东》发表。

卷二

1877年1月（第1号）

第26页：提到“上海老西门”的照片（第6页对页），并称“我们拍摄的这个城门”。

第26页：提到“中国戏剧演员合影”（第4页对页）为“一位中国摄影师拍摄”。

1877年2月（第2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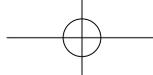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第30页：提到《远东》杂志第一系列中的一篇文章，称“当时的杂志销量不及今日五分之一”。

1877年3月（第3号）

目录页（错印为“1877年2月刊”）上刊发了一则道歉，称“由于天气原因，本期及2月刊杂志迟售……本期杂志因故只收录了5张照片……”

1877年4月（第4号）

第87页：提到“华尔纪念堂落成典礼合影”（第



88页对页)，即华尔总兵生平事迹。称“典礼即将结束时……在寺院内外拍摄了3张照片，然后便匆匆赶回……”

1877年6月（第6号）

第138页：论及1877年5月时，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大会合影照片。称“和其他合影一样，传教士们在拍照时也难免移动，一些人的面孔变得难以辨认。不过大多数人还很清晰。两组人员的合影将会为大会召开留下美好的回忆。”（第131页刊登了照片中不少传教士的姓名）

卷三

1877年7月（第1号）

封面勒口列出了一系列由托马斯·查尔德拍摄的照片。照片由“《远东》杂志艺术代理”销售，地址在上海河南路5号。

第26页：提到余姚（Yuyan）的照片（第24页对页）和“中英混合军”（炮队，第24页对页）的照片为常胜军沃森少校拍摄，并交杂志发表。

1877年8月（第2号）

第50页：提到“永乐大帝陵寝”照片（第36页对页）。称“照片由北京的查尔德先生拍摄并缩印，以供本刊使用。承蒙先生眷顾。查尔德先生在北京附近拍摄了很多照片。”

1877年9月（第3号）

第55页：称“1876年10月的《远东》杂志中，有3张照片拍摄的都是是一年一度祭奠亡灵的仪式……由我刊拍摄……”这说明，这些照片为布莱尔和他的同事们拍摄。

第69页：布莱克提及一名中国摄影师的作品（未点名，但有可能是“公泰”），称“经过七个月的等待，我刊先前派往长江上游拍照的中国艺术家已经归来，并带回照片若干；但作品质量颇让人失望……这些照片只能告诉我们，这些地方本来能孕育出多少

照片佳作……中国艺术家实在不会选景，这几乎是无人不晓的事实；他们通常只能胜任照相馆的工作。不过，总算还有个别照片可用，本期和随后诸期将陆续采用一些。”

1877年10月（第4号）

第90页：“1871年9月6日……60名琉球海难者在台湾东海岸……被原住民所结‘牡丹社’杀害……李仙德将军于1872年2月29日乘美国汽轮‘亚士维拉’号（Ashuelot）赶往台湾，直奔琉球人遇害地点。船上除指挥官外，还有一名外科医生、一名测绘员、一名海军侦查员、一名摄影师、一名翻译，以及两位向导。”

第94页：提到“昆山水门”这张照片（第74页对页），称“昆山城被攻破的情景在水门照片中赫然可见。此照为坎米奇先生作品，拍摄于戈登部队占领昆山城后。”

1877年11月（第5号）

第113页：澳门附近地区多不为外国人熟悉。“爱德华兹先生在澳门旅居多年。他是名优秀的摄影师，向我们发来一些他在港口及附近拍摄的照片，让人赏心悦目。他还送来一些台湾的照片；我们至少翻制了4张，准备采用。”

1877年12月（第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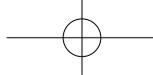
第140页：“北京的托马斯·查尔德先生在北方拍摄了几百张风景及人物照。本期杂志有2张照片出自他手，分别是‘北方冬季滑冰照’（第120页对页），以及‘北京的马车’（第124页对页）。”

第140页：“北京仕女照”（第128页对页）“由一位中国摄影师拍摄”。

卷四

1878年1月（第1号）

第22页：提到圣朱利安·爱德华兹所拍照片，称“我



们非常感谢厦门的机敏的摄影艺术家爱德华兹先生，向我刊提供澳门与台湾照片若干 [1877年11月刊]。我们在本期和后续杂志中将陆续刊出，希望能时常把这个‘美丽海岛’的风情向读者展现出来。”

第23页：长城照片（第22页对页）“据北京的托马斯·查尔德所拍大照片缩制”。

1878年5月（第5号）

第118页：从照片说明看来，“苏州年轻仕女像”（第108页对页）由布莱克拍摄。拍照过程很吸引人：“这位年轻姑娘稍有些任性。她不喜欢外国家具，但由于手边实在找不到中国家具，她也只好妥协，坐在小桌旁边。桌上按照她的意思摆放了花瓶、烟枪、茶杯和香水瓶；她从仆人手里拿过一本书，摆了个姿势，端坐好。”

1878年6月（第6号）

第143页：称“唐廷枢”照（第124页对页）由“桑德斯先生特意为本刊拍摄”。唐廷枢是中国名商人。

卷五

1878年7月（第1号）

第24页：暗示“上海综合医院”（第9页对页）照片为布莱克作品。称“我们在去年拍摄了这张照片。”

刊印征订启示，订阅费降价，每季度3.5美金，半年6美金，全年10美金。

1878年10月（第4号）

第94页：论及“宁波中英常胜军”照片（第78页对页），称“本刊此前所刊常胜军照片由其指挥官拍摄 [作者注：指沃森少校，参见1877年7月刊]。本期杂志的这张照片由坎米奇先生拍摄。”

第94页：“安庆道台与家眷合影”（第82页对页）“由中国摄影师‘公泰’拍摄。公泰受道台之命，拍摄了这张照片及许多风景照，道台对其款待有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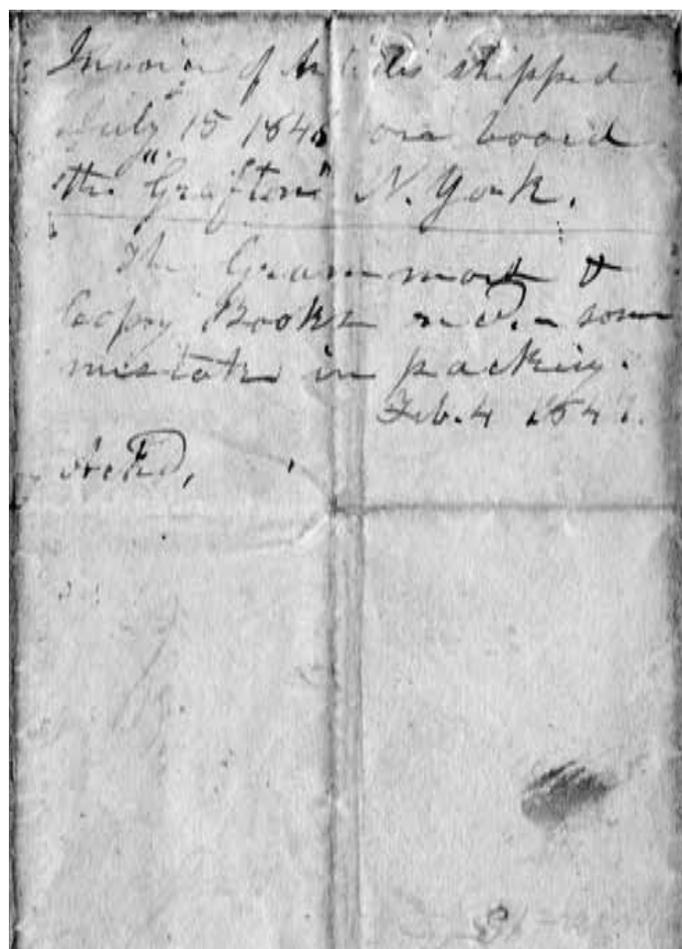


附录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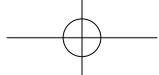
裨治文的银版照相机

此为美国来华传教士裨治文的一则收据影印件，落款日期为1846年7月15日。依收据所列，裨治文当时收到一架银版照相机、化学药品及若干其他设备。裨治文在广州旅居多年，于1847年迁至上海，于1861年在上海去世。他是否在广州使用过这套拍摄器材？是否把它们带到了上海？这些都是疑问。

裨治文是位兴趣广泛、动手能力很强的人。除传教工作外，很有可能对摄影也感兴趣。比如，在编辑《中国丛报》时，他就筹建了一所印刷厂。此外，他与英国传教士老马礼逊博士（即马儒翰之父）过从甚密。马礼逊在外交工作之余，也爱好摄影。1844年时，裨治文还曾在美国顾圣访华使团中效力。顾圣一行中，配有摄影师乔治·R.韦斯特。遗憾的是，他的几本主要传记对摄影之事都未曾提及。他若果真擅长摄影，则不免可惜。相关著作包括：爱利莎·裨治文（Eliza Bridgman）所编《美国赴华传教先驱：裨治文生平》（1864年），以及迈克尔·C.拉辛克（Michael C. Lazich）著《裨治文》（2000年）一书。这份收据引出了早期传教士在沿海商埠从事摄影活动的问题，值得再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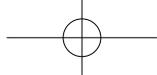
图A82a 裨治文在广州的照相器材收据，1846年7月15日，封面页。
马修·伊森伯格收藏。



*Invoice of Articles sent to Bangkok shipped
by Henry Hill Treas on board the Bark Grafton
Abbott Master at New York bound for Canton consigned
to Rev. C. C. Bridgman of the latter pl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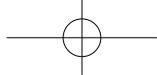
<i>Rev. Caswell Bangkok Seam.</i>	<i>One Box containing</i>			
	<i>1 Doz. Dysentery Cordials including the Box</i>			<i>8.00</i>
<i>No. 1.</i>	<i>One Box containing</i>			
	<i>6 School Globes @ 1.50</i>	<i>9</i>		
	<i>2 Sets Geological Specimens each</i>	<i>6</i>		
	<i>1 Thermometer</i>	<i>1</i>		
	<i>Box</i>	<i>2.5</i>	<i>16.25</i>	
<i>No. 3</i>	<i>One Box containing</i>			
	<i>1 Doz. 4 Oz Ink in a small box</i>	<i>75</i>		
	<i>1 " Soft Tooth Brushes</i>	<i>1.17</i>		
	<i>248 Fosters copy Books & set</i>	<i>19.20</i>		
	<i>1 Barnes Ephorians</i>	<i>67</i>		
	<i>35 Vols. Photo juveniles</i>	<i>7</i>		
	<i>1 Gallate Logarithms</i>	<i>3.75</i>		
	<i>1 Bowditch's Navigator</i>	<i>3.50</i>		
	<i>12 Parkers Grammar 1st 1st</i>	<i>1.80</i>		
	<i>12 " composition</i>	<i>1.35</i>		
	<i>Periodicals for the Mission Missy's Herald & Paper done</i>			
	<i>Box</i>	<i>30</i>	<i>39.44</i>	
		<i>63.74</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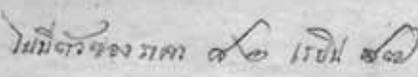
图A82b 裨治文在广州的照相器材收据，1846年7月15日，首页。马修·伊森伯格收藏。



	Amount brought forward	63 7/4
Rev. J. Caswell	One Box containing	
Bangkok	1 German Daguerreotypy Materials	
Siam	1 Voigtlander half size Camera No 1313 78 11	
No. 4	2 Coating Boxes	15 00
	2 Boxes extra fine Rouge	2 00
	2 Spirit Lamps	1 00
	1 Iron Rest for the Boxes	3 50
	1 Stand for Camera	3 00
	2 lb fine Cotton for cleaning Plates	1 00
	2 Bottles Chemical for 2 nd Coating	3 00
	3 Oz Dry Iodine for 1 st Coating	3 50
	24 Cases 1/2 size	7 00
	24 Plates 1/2 "	8 00
	1 Buff Leather for polishing	2 50
	1 P. Mix for holding the Plates	2 50
	1 oz of Chloride of Gold	3 50
	3 lb Hydr Sulphate of Soda	6 00
	3 Rotten Stone	3 00
	1 Tripole	1 00
	Gold beater's Skin (paper will do ^{with glue})	1 00
	18 Ebony Picture Frames	4 00
	1 Oz of pure Bromine	2 00
	1 Vol of Flesh Colour	2 00
	1 Box colors for giving a -	
	- Tint to the Pictures	3 50
	1 Mercury Bath	5 00
	6 Small Plates	1 37
		165 12
		63 7/4

图A82c 裨治文在广州的照相器材收据，1846年7月15日，第2页。马修·伊森伯格收藏。



Amount brought forward	165 12	63 7/4
12 1/4 Plates	4 00	
6 1/4 do	4 50	
12 Cases large 1/4 size	16 00	
packed in bottle 2 - 1 Bottle Mercury	1 00	190 62
		254 36
<u>Charges</u>		
Purchasing Packing & Shipping		17 00
Cartage, Wharfage, Freight & Insurance		27 50
		44 50
Boston July 15. 1846.		
H. Hill		
Rear		
		
		
		

图A82d 裨治文在广州的照相器材收据，1846年7月15日，第3页。马修·伊森伯格收藏。